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91 2019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翻譯季刊

二〇一九年
第九十一期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二〇一九年三月 第九十一期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91, March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9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91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創刊主編 **Founding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主編 **Chief Editors**

李德超 Li Dechao

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s**

陳嘉恩 Shelby Chan 李 波 Li Bo

劉康龍 Liu Kanglong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陳潔瑩 (主席) Elsie Chan (Chairperson)

張其帆 Cheung Kay Fan Andrew

李德鳳 Li Defeng 李忠慶 Lee Tong King

龍惠珠 Lung Wai-chu Rachel 潘漢光 Joseph Poon

鄧 彧 Duncan Poupard 邵 璐 Shao Lu

洪蘭星 Stella Sorby 鄢 秀 Yan Xiu Jackie

王斌華 Wang Binhua 鄭冰寒 Zheng Binghan

Sara Laviosa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Mona Baker

林文月 Lin Wen-yueh Cay Dollerup

羅新璋 Luo Xinzhang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Wolfgang Lörcher

謝天振 Xie Tianzhen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楊承淑 Yang Chengshu

編務經理 **Editorial Manager**

馬偉東 Tony Ma

編者的話：

本期共收錄四篇學術論文，涉及口譯培訓、經典翻譯、中國文學外譯和接受等議題。

郭聰和楊承淑等人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與國際醫療翻譯協會（IMTIA）聯合舉辦的「醫學英文口譯工作坊」短期培訓為個案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基於柯氏模型對本培訓效果進行評估，並提出依循受訓學員能力發展路徑的培訓模式。針對亞瑟·韋利和王際真在《紅樓夢》英譯中的“夢境”之爭，江帆試圖重返歷史現場，將譯本序言作為核心文本現場，由此層層向外輻射，通過大量歷史文獻，如相關人物同時期其他著譯、回憶錄、日記、書信、評論等史料的互文考證，對這一翻譯現象作出更為貼合歷史語境的解釋。

孫會軍首先梳理了賈平凹的《廢都》在國內出版、被禁、解禁的經過，總結海內外華裔讀者對這部小說的看法，以及小說在日本、法國的接受，然後結合英文版譯者序、出版社對英文版的推介，以及英譯本在圖書館收藏情況和書評，探討這部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和接受情況，並嘗試從場域、資本以及行為人（Agent）等翻譯社會學視角出發，對譯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現象進行解釋和分析。趙雲龍以朦朧詩人楊煉為個案，從館藏分佈、書評和獲獎情況三個方面考察了楊氏12部英譯個人詩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研究發現，《大海停止之處：新詩集》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優秀的作品本身比背後的政治風向和文學史的源流演變更具生命力、影響更長遠；譯者樂於選譯的未必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的傳播與接受效果與翻譯模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本期最後收錄了劉靖之教授書寫的“香港翻譯學會的發展（1991-

2018) ”第二部分，內容涉及學會主辦的研討會、學術會議、講座、論壇，學會會員的著作，學會頒發的獎學金，學會舉辦的翻譯和口譯比賽等歷史資料，彌足珍貴。

踏入二〇一九年，本刊亦對編輯委員會作了改組。從本期開始，編委會主席將由香港翻譯學會學長陳潔瑩博士擔任，季刊主編將由李德超博士接替。前主編陳德鴻教授在服務本刊十四載後榮休，另一主編倪若誠教授亦在主持編務工作多年後，因公事紛繁，不得不告別本刊。在他們手中，本刊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學界同仁中的口碑日隆，我們為此由衷感激。我們編輯部的全體同仁，定會繼續努力，保持季刊一貫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色，為廣大的翻譯愛好者和學者服務。

李波

二〇一九年三月

目錄 CONTENTS

iv 編者的話

論文 Articles

- 1 以柯氏模型為指導的醫療人員口譯培訓效果評估——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為例 郭聰、楊承淑、張昆松、尹瑩、匡銘
- 27 透過翻譯現象深化文學關係研究——再論亞瑟·韋利和王際真在《紅樓夢》英譯中的“夢境”之爭 江帆
- 59 賈平凹小說《廢都》在海外的翻譯與接受 孫會軍
- 77 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基於英譯本館藏分佈、評論及獲獎情況的考察 趙雲龍

回憶錄 **Memoir**

- 97 香港翻譯學會的發展 (1991-2018) (二) 劉靖之
- 111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 115 徵求訂戶啟事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 117 訂戶表格 *Subscription and Order Form*

以柯氏模型為指導的 醫療人員口譯培訓效果評估 ——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為例

郭聰 楊承淑 張昆松 尹瑩 匡銘

Abstract

A Case Study Using the Kirkpatrick Model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Interpreting Training on Medical Personnel (by Guo Cong, Yang Chengshu, Zhang Kunsong, Yin Ying and Kuang Ming)

The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TD) adopts the Kirkpatrick model, also known as the “four-level model”,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terpreting training in terms of reaction, learning, behavior, and results. Based on the Kirkpatrick model, focusing on the “Medical Interpreting Workshop” jointly organized by a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 (IMTIA), this research uses a cas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s to evaluate the training effect and then proposes a training model which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trainees’ ability-development roadmap.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rainees are interested in interpreting and register a high satisfaction with this training. They are able to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strategies, and skills of interpreting. By analyzing trainees’ performanc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y consciously pu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the test, and show improved fluency and logic during interpreting sessions. In a final step, the instructors select interpreters among the medical staff, basing their selections on the above result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tems, and the selected individuals are recommended to the hospital.

一、前言

組織內培訓指“系統性地習得可在其他情境中改進績效的技巧、規則、概念與態度 (Goldstein & Ford, 2002: 1)”。為因應醫院國際化發展趨勢，培養醫療口譯人才及外語人才，2017年8月底至9月初，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與國際醫療翻譯協會 (IMTIA) 聯合舉辦了“醫學英文口譯培訓”。^[1]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運用柯氏模型 (the Kirkpatrick model) 暨四層次培訓評估模式 (Four-level model)，使用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的方法，對本次培訓的效果進行調查與分析。該模型從“反應”、“學習”、“行為”和“成果”四個層次評估培訓的效果。

二、研究背景

當下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國際交流已經成為常態，大量外籍人士來華工作、旅遊、學習甚至定居，勢必對與自身息息相關的醫療資源有需求和要求。在2015年11月和2016年6月分別召開的“世界醫療旅遊與全球健康大會”(WMTTC) 亞太博覽會和博鰲會議上，與會專家學者探討了中外醫患資源交換、國際和國內患者對醫院的需求、醫院未來發展趨勢、中醫國際化、遠程醫療與健康服務創新、醫療保健機構質量管理實施、中醫藥健康旅遊合作、醫療投融資、醫療跨境保險理賠等醫療及醫療旅遊領域備受關注的議題(中國新聞網, 20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 2016)。無論是外國病患就醫，還是中國醫藥走出去，都推動著醫院向高水平、國際化發展。2016年7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佈〈關於印發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意見

的通知》，提出〈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中批示，“公立醫療機構提供的特需醫療服務及其他市場競爭比較充分、個性化需求比較強的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2016: 3）。在保證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質量的前提下，公立醫院可對三類醫療服務項目實施價格開放。第一類是特需服務；第二類是因醫學技術發展產生的新增醫療服務項目，第三類是市場競爭充分、個性化需求較強的項目，如醫學美容、遠程會診和中醫調養等（京報網，2016）。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更是為醫院國際化帶來了巨大契機。醫院國際化不僅包括醫院硬件質量的提高，還體現在醫師、護理師等醫療服務提供者自身的國際化水平上。醫療人員國際化水平不僅反映在醫療技能、醫療水平上，還強調國際學術交流能力、醫患交流時的語言溝通能力、與國際專家會診、撰寫高水平論文以及醫療場域口筆譯能力。

前人對醫療場域口譯的研究多針對醫患對話的診問口譯（侯闓，2011; Tschurtz, et al., 2011; 詹成，2013; Nápoles, et al., 2015）。Meyer et al. (2010) 強調，醫療人員需要“高標準的翻譯能力”以減少錯誤的發生。但是研究發現醫護人員的語言能力並沒有得到檢驗，而且嚴重缺乏相關口譯培訓（Moreno, Otero-Sabogal, & Newman, 2007）。更沒有研究對醫療人員口譯培訓的有效性進行檢驗。

在國際病患數量增加，國家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醫院向高水平、國際化發展以及醫療人員個人能力提升需求的前提下，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與“國際醫療翻譯協會”（IMTIA）聯合舉辦了“醫療英文口譯培訓”。受訓學員為該院內、外、婦、兒等專業的臨床教師、住院醫師、教學管理人員等，其中多數為外科醫師。

表一 課程大綱

單元	課程大綱
1	口譯緒論、面對觀眾、中英雙語表達、跟述
2	短逐步口譯技巧與練習(中英雙向)
3	視譯技巧訓練(中英雙向)
4	口譯筆記技巧、數字口譯演練
5	長逐步英譯中練習、口譯會前準備
6	長逐步中譯英練習、長期自我訓練方式
7	醫學口譯實境模擬
8	醫學口譯實境模擬

培訓過程分為前期測試、講師教學、模擬演練、中期考核和結業考試，全部通過方為合格。前期測試為繳交英文簡歷及個人英文自述音頻，用於瞭解學員背景、外語水平、學習動機和需求。中期考核內容為視譯，結業考試為醫療場域的交替傳譯。培訓共4天，24小時。課程大綱如表一。

高水平的醫療機構在人才選拔、培養與錄用上均有嚴格要求。但醫院如何善用人才、挖掘和培養醫療人員能力配合醫院高水平、國際化發展，亦是醫療機構在新形勢下應當探索的問題。本培訓不僅為醫療人員提供有效的口譯能力培養課程，還協助院方建立了醫療口譯人才儲備庫。

三、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個案研究法，運用柯氏模型的四個層次對本次口譯培訓的效果進行評估，並將量化與質化相結合，以問卷調查、訪談、觀察

為主要研究方法；在培訓過程及各層次的評估過程中，採用問卷星平台、Excel 2017、IBM SPSS 23為工具進行數據收集、處理與分析。

3.1 柯氏模型

培訓對於一個組織整體人力資源管理的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因為通過培訓加強知識和技能可以為組織及其人員提供持續的競爭力（Torrington, Hall, & Taylor, 2008; Beardwell & Thompson, 2014; Noe, et al., 2015）。而評估培訓的目的在於採用系統的方法收集培訓活動的信息和數據，以評定培訓的有效性（Goldstein & Ford, 2002: 22-33）。D. L. Kirkpatrick和J. D. Kirkpatrick（2009: 5）闡明了評估培訓的三個主要原因：（1）改善培訓；（2）最大程度上將“學習”轉化成“行為”和“組織成果”；（3）向培訓主辦方展示培訓成果。因此，在培訓評估階段，必須採用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訓模型，方能對培訓效果做出客觀、合理的解釋。

柯氏模型由唐納德·L.柯克帕特里克（Donald L. Kirkpatrick）博士於1959年提出，由其本人、其後人及眾多研究者不斷完善，並為人才發展協會（ATD）大力採用，至今廣泛用於指導和評估成人職業培訓效果。^[2]該模型從四個層次評價一項培訓：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和成果（outcome）（參見圖一）。

圖一 柯氏模型結構



第一層次重點評估學員對培訓的反應，包括受訓者對培訓是否產生了積極的情感反應即對培訓感到滿意與否，或對知識的有用性作出評估；第二層次考察受訓者因培訓而習得或改善的技能和態度；第三層次涉及受訓者行為改變與學習遷移情況，也就是受訓者是否在日後的工作或學習上應用了培訓所學；第四層次旨在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衡量培訓對組織目標、成本、生產力等產生的影響。

Arthur Jr、Bennett Jr和Bell (2003)使用162篇採用柯氏模型進行評估的前人研究建立數據庫，透過後設研究發現，在標記的397個獨立數據點中，以學習為評估效標佔最大比例，其次是行為，足見這兩個層次的評估在既往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Bates (2004: 341-342)認為該模型明確指出了應該問哪些問題以及採用哪些合適的評估標準，減少了培訓評估的測量難度，並且由於模型根據培訓效果進行評量，因此大大減少了培訓評估人員所要關注的變量個數，只需要圍繞培訓過程展開，不需要考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該評估模式前兩個層次集中在受訓學員本身，第三個層次既關係到學員又涉及到組織，第四個層次重點考察組織效益。其期望是培訓應對組織成果產生影響，並且前提是這種影響可以被評估。美國訓練與發展協會200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組織中，91%採用柯氏模型第一層次，54%採用第二層次，23%採用第三層次，8%採用第四層次。³⁾第三、第四層次採用率較低，這是因為相比於“受訓者反應”和“習得知能”，“行為改變”更難以量化，也不便於解讀。出於現實考量，個體的行為改變尚難以評價，組織的行為則更為困難。

3.2 柯氏模型的應用

柯氏模型常被用於組織訓練和教育訓練效果評估 (Curran & Fleet,

2005; Abdulghani, et al., 2014; Rafiq, 2015; Vizesfar,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在 *Seven Keys to Unlock the Four Levels of Evaluation* 一文中，D. L. Kirkpatrick (2006: 5-6) 指出，進行四層次評估時應得到主管支持 (Involve your managers)：詢問主管對受訓者應得到何種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培訓，請主管創造良好學習氛圍，並在模型第三、四層次邀請其協助調研。在本次評估中，儘管講師團隊為外部聘請之專家並非醫院內部人員，我們同樣獲得了主管的充分授權與支持。

醫療人員不同於學生和一般在職人士。由於工作性質，醫療人員隨時準備趕赴救死扶傷第一線，學習時間緊，並且職業的要求使得醫療人員的工作、學習都養成了精準、高效的習慣。因此，為達到良好的出席率以確保學習效果，培訓必須在密集的時間內完成，課程內容必須良好對接院方需求。在培訓期間調動學習氛圍，得到醫院支持而使得各項後勤保障順暢，是培養和選拔醫療口譯人才的保障。

根據D. L. Kirkpatrick和J. D. Kirkpatrick (2009: 21-61) 對該評價模

表二 柯氏模型的應用

層次	評價重點	關鍵問題	評價工具和方法
I. 反應	受訓者滿意度	醫療人員受訓者對培訓或學習經驗的評價	滿意度調查表 訪談主管 受訓者意見和建議收集
II. 學習	知識、技能的學習	衡量培訓前後知識、技能的改變	訓前、訓中、訓後測試 學習自評表 課堂觀察 受訓者意見和建議收集
III. 行為	受訓者行為改變	學習對醫療人員行為的影響	受訓學員能力發展路徑圖 (訓後一段時間) 訓後觀察 訪談主管及受訓學員
IV. 成果	對所屬組織的影響	醫療人員的行為改變是否對所屬組織產生了影響	訓後觀察 長期跟蹤、調查、研究

型的闡述，結合本研究的背景，考慮到醫院需求和醫療人員特點，及評估順利進行等條件，表二列出本次評估的評價重點、各層級的關鍵問題，及評價工具和方法。

依照表二所列評價工具和方法，研究者製作了三項調查問卷，並結合訪談法和課堂觀察，以及歸納總結學員測試情況，圍繞柯氏模型各層次評價重點和關鍵問題，對本次培訓的有效性進行評估。

四、研究過程

在培訓結束後，針對柯氏模型的第一、二、三層次，研究者做了三項問卷調查，分別是滿意度調查（“反應”）、學習自評表（“學習”）和受訓學員能力發展路徑圖（“行為”）。本研究所有調查問卷使用“問卷星”發放和回收，從該平台後台導出.sav和.xls格式數據，根據具體情況採用IBM SPSS 23和Excel 2017進行統計和分析。

4.1 第一層次：反應

在“反應”層次，主要評估受訓者對培訓的滿意程度，即醫療人員對培訓或學習經驗的評價。採用滿意度調查表作為評量工具，對各項評價指標進行量化統計，並收集受訓者意見和建議，最後通過訪談主管人員補充統計數據。

（1）滿意度調查

滿意度調查旨在掌握受訓者對課程、講師、教材滿意度，參與後續課程意願，以及受訓者對課程和講師的意見和建議。

a. 問卷設計

本滿意度調查基於D. L. Kirkpatrick和J. D. Kirkpatrick(2009)著作

以柯氏模型為指導的醫療人員口譯培訓效果評估

中提供的樣例，並結合本次培訓的實際安排、課堂內容以及講師表現進行問卷設計。依照D. L. Kirkpatrick和W. K. Kirkpatrick (2016)對施測方法、工具和時機的建議，本滿意度調查問卷向正式學員和旁聽學員發放，回收有效問卷26份。^[4]問卷分為受訓者基本情況、各項評核指標以及意見收集三部分。評核指標共18題，其中2題為整體滿意度與下次參加同類培訓意願調查，採用李克特5級量表。非常滿意記5分，滿意記4分，一般記3分，不滿意記2分，非常不滿意記1分。

b. 統計證據

滿意度調查問卷採用IBM SPSS 23統計工具。用SPSS進行頻率分析，各項評核指標統計數據如下：

表三 醫療口譯培訓滿意度數據

	個案數		平均值	中位數	標準差	範圍
	有效	缺失				
課程的流程與安排	26	0	4.54	5	0.582	2
課程主題和內容的適切性	26	0	4.65	5	0.562	2
講者提供的講義教材與資料	26	0	4.23	4.5	0.908	3
本次課程開拓我對相關領域的視野	26	0	4.69	5	0.549	2
本次課程深化我對相關領域的認知	26	0	4.73	5	0.604	2
講者能適當地回答我的問題	26	0	4.77	5	0.514	2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A.你認為講師的學識及經驗)	26	0	4.92	5	0.272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B.你認為講師聲音的運用技巧)	26	0	4.88	5	0.326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C.你認為講師面帶微笑與你眼神接觸)	26	0	4.88	5	0.326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D.你認為講師手勢的靈活運用及站姿)	26	0	4.92	5	0.272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E.你認為講師的服裝整齊儀容端莊)	26	0	4.96	5	0.196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F.你認為講師的課程內容準備)	26	0	4.96	5	0.196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G.你認為講師教學的態度能力)	26	0	4.77	5	0.43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H.你認為講師教學的態度能力)	26	0	4.92	5	0.272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I.你認為講師回答問題的能力)	26	0	4.92	5	0.272	1
請根據您的個人感受選擇(J.你認為講師時間掌控的能力)	26	0	4.73	5	0.604	2
整體滿意度	26	0	4.77	5	0.43	1
若舉辦類似的課程，我願意參加	26	0	4.73	5	0.533	2

表三顯示，所有課程、講師與整體滿意度相關指標均達到“滿意”(4分以上)，但“講者提供的講義教材與資料”一項得分相對較低。在意見和建議一題當中，與該問題直接相關的建議是學員希望講者提供所有材料包括視頻、音頻的逐字稿。

(2) 受訓者意見和建議收集

在培訓中期經院方主管及問卷調查中開放性問題瞭解到如下反饋和建議：

- 通過課程學習，學員瞭解到口譯基本知識，並對譯者能力與素養有了一定認知。
- 學員提出增加課時，以進行更多學習和練習。
- 為基礎較強的學員提供進階課程。
- 部分學員提出應以口譯技巧和策略為主，盡快與實際需求對接。
- 主管提出適度降低第一期培訓的難度，循序漸進，使學員對口譯能力的養成更加有自信。
- 學員要求講師在結訓後提供練習資料和口譯學習資源網站，供長期自我訓練。

(3) 小結與建議

根據滿意度調查和意見收集結果，在“反應”層次，受訓者對培訓各項指標滿意度高，對學習體驗抱持積極、正面的態度，肯定講師的教學能力、態度和方法。總體滿意度高，再次參加此類培訓意願強。

根據統計證據，“講者提供的講義教材與資料”得分相對較低。具體查看評價結果，發現有7名學員給出4分，5名學員給出3分，1名學員給出2分的評價，整體給分情況低於其他指標。

培訓講義分為兩部分，課前發放一本講師自編教材，上課過程中再發放練習材料。經過與受訓學員交流瞭解到，醫療人員群體對事件及程序具有非常高的計劃性，預期培訓前能夠得到確定的教材，因此對講師根據學員水平在第二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調整難度而增減及少量改變原有資料的教學方法產生了一些不適應，還有一些資料是設計在練習環節發放給學員，僅留一定時間做譯前準備。在實踐中，譯者難免遇到主辦方臨時調換講稿，或開講前才給到資料的情況，資料調整也為了考驗譯者應變能力。因此，在日後的培訓當中，可在課前與

學員溝通講師的教學方法及口譯實踐中的常見情況，盡量提供全部逐字稿供學員對照學習，促進教學有效進行。

在意見收集當中發現，學員有興趣長期學習，將口譯發展成為自己的第二專長。另外，學員提出迅速掌握口譯技能與醫院現實需求接軌，主管提出循序漸進培養信心。兩種建議同時出現反應出醫院面臨國際化挑戰亟需口譯人才的現狀與人才培養並非一蹴而就的事實形成的矛盾。需求醫院表示將採用分級分班訓練的方法，設置進階課程為雙語能力強的學員強化口譯能力，在基礎課程中擴大人才培養範圍，為人才發掘、養成和選拔奠定良好基礎。

4.2 第二層次：學習

該層次旨在衡量學員培訓前後知識、技能的掌握。本培訓採用訓前自我介紹、訓中視譯測試、訓後交替傳譯測試三個階段，觀察、對比、追蹤學員的學習情況。採用“學習自評表”幫助學員回顧所學，發現不足，同時評量學員對各部分內容的掌握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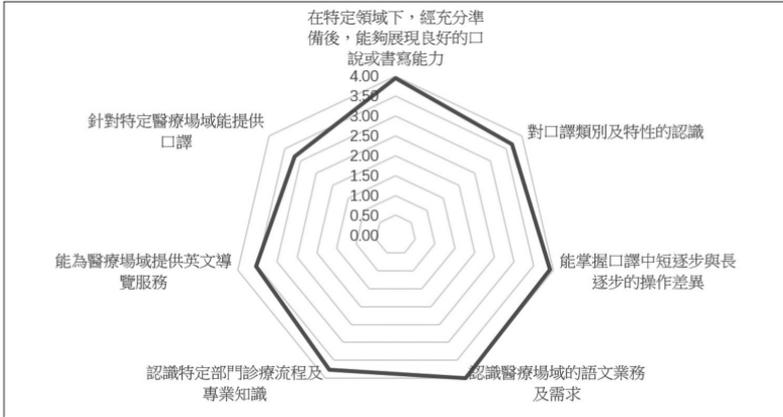
(1) 學習自評表

本問卷設計參照人才發展協會短期培訓問卷樣本，結合本次培訓的實際情況，包括學員基本信息、課程內容掌握情況和口筆譯經驗調查三部分。本問卷向正式學員發放，回收有效問卷22份。課程內容掌握情況採用李克特5級量表，根據收集的數據繪制各項課程內容掌握情況平均得分雷達圖（圖二）。

課程內容掌握情況共設計7題，分為兩個構面：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理論知識包括“對口譯類別及特性的認識”、“認識醫療場域的語文業務及需求”以及“認識特定部門診療流程及專業知識”三項。實踐能力包括“在特定領域下，經充分準備後，能夠展現良好的口說或書

以柯氏模型為指導的醫療人員口譯培訓效果評估

圖二 各項學習內容平均值雷達圖



寫能力”、“針對特定醫療場域能提供口譯”、“能為醫療場域提供英文導覽服務”以及“能掌握口譯中短逐步與長逐步的操作差異”四項。

表四 各項學習內容統計數據

	平均值	標準差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個案數
在特定領域下，經充分準備後，能夠展現良好的口說或書寫能力	3.95	0.84	0.71	3	5	22
對口譯類別及特性的認識	3.68	0.78	0.61	2	5	22
能掌握口譯中短逐步與長逐步的操作差異	3.91	0.87	0.75	3	5	22
認識醫療場域的語文業務及需求	4.00	0.76	0.57	3	5	22
認識特定部門診療流程及專業知識	3.77	0.69	0.47	3	5	22
能為醫療場域提供英文導覽服務	3.55	0.60	0.35	2	4	22
針對特定醫療場域能提供口譯	3.18	0.85	0.73	1	4	22

統計數據顯示(表四),表中各項指標平均值除“針對特定醫療場域能提供口譯”一項外都接近或達到4分(對應選項“同意”),且標準差較小,說明學員之間一致性較高。在前五項問題中,有學員給出5分,說明其對自身的學習成效表示非常滿意。從現實角度來講,結合22位學員的“學習自評雷達圖”,該自評表能夠如實反映學員的學習情況,即在密集培訓中能夠良好地掌握口譯相關理論知識和策略,但實踐能力的習得因背景、雙語基礎等因素而異,需要結合多種方法且進行個別檢視。

(2) 培訓前、中、後期測試

參訓的醫療人員此前並未接受過正規、系統口譯訓練,部分學員由於工作、科研關係有過一些口譯經驗,但均為自行探索。在培訓前的自我介紹音頻中,大部分學員都對口譯學習抱有興趣和好奇心,有部分學員認為口譯能力在個人學術研究、外事交流及境外學習中都起著重要作用;亦有學員存在對口譯認識的誤區,比如認為學習口譯是為了改善聽力和口語。

經過中期的醫療文件視譯測試,發現學員開始有意識地運用諸如順句驅動、預測、詞類轉換等策略和技巧。訓後結業考試內容一段英譯中和一段中譯英的醫療主題交替傳譯,除了運用策略之外,此時學員已經注意到語言的邏輯性與通順性,主動避免停頓時間過長、控制使用贅詞。

(3) 小結

透過學習自評表數據分析和檢視學員前、中、後期測試情況發現,本次培訓能夠讓學員掌握口譯的理論知識,釐清對口譯認知的誤區,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地運用策略和技巧。學員在短時間內達到了認識、理解和掌握基本操作和策略的學習效果。經課堂觀察、測試和意願調查,部分學員已經能夠承擔特定口譯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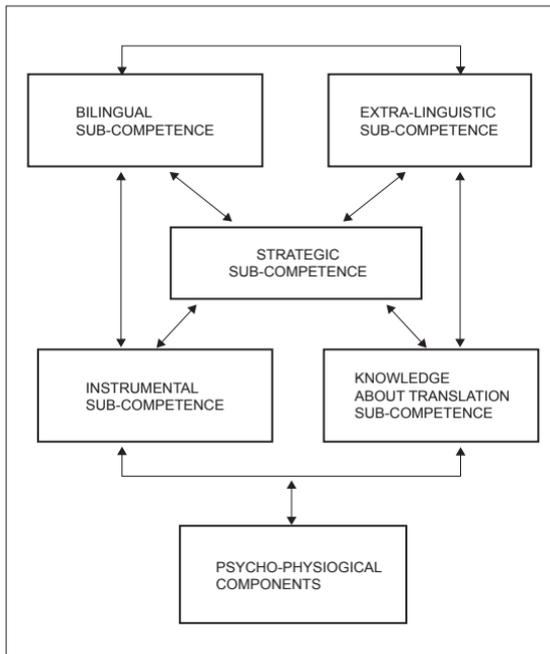
4.3 第三次：行為

柯氏模型第三層“行為”主要考察培訓後學員行為變化。本研究基於翻譯能力的組成，構想並繪制受訓學員能力發展路徑圖，通過圖像方式展現學員行為變化及未來預計發展歷程，提出以能力發展路徑為導向的培訓模式。

(1) 基於需求的醫療場域翻譯能力

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翻譯能力習得過程和評估小組PACTE Group (2003: 60 ; 2005: 610) 提出了由六項翻譯能力構成的翻譯能力整體模型 (A holistic model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圖三)：

圖三 PACTE 翻譯能力模型



引自：PACTE Group (2003: 60; 2005: 610)

PACTE小組認為翻譯能力包括：1. 雙語能力 (Bilingual sub-competence)；2. 語言外能力，包括文化、百科知識、專業領域知識 (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 including bicultural/encyclopedic/subject knowledge)；3. 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4. 工具運用能力 (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5. 翻譯知識 (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sub-competence)；以及6. 身心素質 (Psycho-physiological components)。PACTE小組以策略能力為核心，認為策略能力擔負起解決翻譯相關問題，是保證翻譯過程有效進行的關鍵，起到整體規劃翻譯項目、評估翻譯過程及階段性成果的作用，並可激活其他能力以資彌補 (2005: 609-619)。[5]

根據PACTE翻譯能力整體模型分析參訓學員的能力組成與培訓需求，我們首先確認教學重點，並為訓後繪制醫療人員口譯能力發展路徑圖做準備。

培訓前由院方和講師團隊在報名人員中甄選雙語能力佳的學員，很多學員具有國外學習、工作經歷，或曾赴境外交流及經常參加國際會議。良好的雙語基礎是短時間密集培訓產生良好效果的保障。而工具運用能力暫時不是本次培訓的教學重點。學員們在工作、參加國際會議、科研、國外進修、境外工作等情境中，學員會遇到需承擔口譯任務的情況，類型包括陪同口譯、交替傳譯、耳語同傳和會議同傳。從醫院層面來看，無論是國際交流、外賓接待，還是承辦國際會議，均希望能派出本院醫護人員承擔口譯任務。因為(a) 醫療人員本身具有扎實的醫學專業背景，譯文專業性高，能夠對熟悉領域進行預測，尤其是英譯中，易被同行接受；(b) 減少與承擔翻譯任務的第三方溝通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迅速派出本院人員；(c) 長期培養能夠為本院提供語言服務的人才；(d) 打造醫院國際化的名與實，提高醫院聲

譽。我們的目標並非培養職業譯者，而是有口譯能力的醫護人員，因此重點培養策略能力，強化醫療領域口譯知識和技巧。

根據翻譯能力的組成，結合醫療場域實際情況，考慮醫院對醫療人員外語能力應用的短、中、長期需求，以及將口譯能力視為語言應用能力的一部分，本培訓設計了由六組18項指標組成的醫療翻譯人才能力發展路徑圖（圖四）。

圖四 受訓學員能力發展路徑圖

序號	培訓項目	檢核項目			能力養成
		1	2	3	
A	中英口語表達	會議致詞	報幕	外賓接待	研討會運作與接待
B	中英演說能力	研討會主持人	引言人	現場提問	公眾演說+臨場應變
C	中英摘述能力	心得報告	PPT演示	文獻摘述	教學與傳授
D	中英短逐步口譯	隨行口譯	拜會口譯	診問口譯	外賓接待/診療口譯
E	中英醫學口譯	醫學演講口譯	現場問答口譯	病例討論口譯	醫療學術活動口譯
F	醫療英語實踐	病史採集	病例彙報	診問角色扮演	醫療英語互動能力

來源：本研究作者繪製

(2) 繪制醫療翻譯人才能力發展路徑圖

在培訓結束後，我們請受訓學員根據個人實際情況，在18項能力當中，分別選出訓後可承擔的任務和未來想承擔的任務，並對自己的選項排序，不限選項個數。

依照個人能力發展路徑，學員可根據自身發展階段承擔相應工作；院方亦可根據各學員發展路徑圖委派合適的任務。整體統計結果可呈現醫療人員群體能力發展路徑，反映培訓效果及學員意願，為培

訓主辦各方提供未來培訓重點及策略制定參考。選擇並排序後，以學員A個人發展路徑圖為例（圖五）：

圖五 學員A個人能力發展路徑圖

階段	路徑
參加此次培訓後，您認為自己目前可以承擔以下哪些任務？	A3. 外賓接待→F1. 病史採集→F3. 診問角色扮演→D1. 隨行口譯→D3. 診問口譯
你希望日後可以承擔以下哪些任務？	E1. 醫學演講口譯→E2. 現場問答口譯→A1. 會議致辭→D2. 拜會口譯→E3. 病例討論口譯→B3. 現場提問

目前能力當中，學員中最少填寫1項能力，最多12項，平均6項；^[6]在未來發展目標的選擇中，學員中最少填寫1項目標，最多18項，平均7項。^[7]

經瞭解，前5項能力在學員的排序中最為重要，因此在計算時，將每名學員的前五個選項按照權重賦值，第一順位為5分，第二順位為4分以此類推，未選為0分。使用Excel 2017數據透視表計算後排序，分別得到目前和未來可承擔的任務排序如下表5所示：^[8]

表五 學員能力發展路徑順位總表

目前可承擔的任務				未來想要承擔的任務			
排名	項目	選中次數	總分	排名	項目	選中次數	總分
1	F1. 病史採集	13	49	1	A3. 外賓接待	10	36
2	C2. PPT演示	12	41	2	E1. 醫學演講口譯	12	36
3	F2. 病例彙報	10	32	3	C2. PPT演示	12	35
4	A3. 外賓接待	9	29	4	D1. 隨行口譯	11	30
5	A1. 會議致辭	5	23	5	A1. 會議致辭	7	29
6	F3. 診問角色扮演	7	23	6	E2. 現場問答口譯	9	23
7	B3. 現場提問	5	18	7	F2. 病例彙報	6	22
8	A2. 報幕	3	13	8	B3. 現場提問	5	19

以柯氏模型為指導的醫療人員口譯培訓效果評估

9	E3. 病例討論口譯	4	13	9	C1. 心得報告	6	17
10	D3. 診問口譯	6	12	10	C3. 文獻摘述	5	17
11	C1. 心得報告	4	11	11	F1. 病史採集	4	16
12	D1. 隨行口譯	6	11	12	E3. 病例討論口譯	5	13
13	E2. 現場問答口譯	4	10	13	F3. 診問角色扮演	3	12
14	C3. 文獻摘述	2	8	14	D2. 拜會口譯	3	8
15	E1. 醫學演講口譯	3	8	15	D3. 診問口譯	4	8
16	B1. 研討會主持人	2	5	16	B1. 研討會主持人	3	6
17	D2. 拜會口譯	1	5	17	A2. 報幕	3	3
18	B2. 引言人	1	4	18	B2. 引言人	1	1
總計		97	315	總計		109	332

觀察上表數據發現，學員未來想要承擔的任務中，前6項為參與國際會議會前接待、會中展示與討論、會後交流所要求具備的能力；第7-10項為學術研究及交流所需外語能力。醫學演講口譯、隨行口譯、現場問答口譯順位顯著靠前，反映出學員強化醫療口譯各項能力的意願和需求。

通過逐一檢視23份有效問卷中學員的選擇，得出如下數據(表6)：

表六 逐一檢視個人能力發展路徑結果匯總

類別	人數
口譯類能力作為目前可承擔任務前5位	11
口譯類能力作為目前可承擔任務第1順位	4
口譯類能力作為未來可承擔任務前5位	21
口譯類能力作為未來可承擔任務第1順位	6

表六中數據顯示，經過24小時的密集強化訓練，有4名學員明確表示能夠承擔特定口譯任務，11名學員認為自己有一定能力進行口譯。在未來承擔任務的意願表示中，多達21名學員願意承擔一定的口譯任務，6名明確表示未來願意將特定口譯任務作為第一順位。

(3) 小結

繪制醫療翻譯人才能力發展路徑圖，一方面起到調查學員意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將抽象的口譯能力培養和發展階段具體化、視覺化，具有目標性強、個性化、可量化的特點。既作為向院方推薦口譯人才的重要佐證之一，又為後續課程設計提供依據。

經過學習，部分學員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習得並認可了自己的翻譯能力。這部分學員具備良好雙語能力，經過口譯策略、技巧的學習，以及課堂實戰演練，加之醫療人員扎實的專業背景，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承擔口譯任務的能力。

統計證據表明，醫療人員未來承擔醫學演講口譯、隨行口譯、現場問答口譯的意願明顯。另外，在結訓後，講師團隊通過微信平台持續六周向學員發交口譯視頻教材，平時工作忙碌的醫護人員在業餘時間進行自我訓練，長期學習、鞏固訓練成果。本次培訓促使學員行為發生了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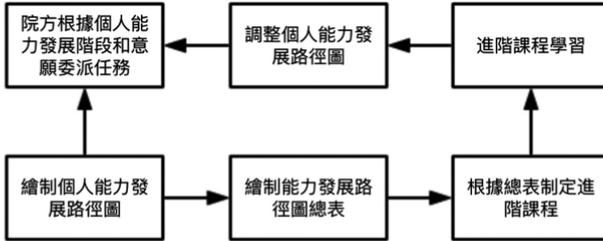
以學員能力發展路徑為導向的口譯培訓將應用在後續的進階課程當中，根據“學員能力發展路徑順位總表”，著力培養在醫學演講、隨行和現場問答場景下的口譯訓練，包括交替傳譯和同聲傳譯。針對個人能力發展路徑圖，學員可根據自身水平和意願設定具體學習目標、衡量自身發展階段；院方可根據該路徑圖選拔人才，交付合適任務。至此，路徑圖、學習成果和課程設計形成循環，對接院方需求（如圖六）。

以學員能力發展路徑為導向的口譯培訓模式適用於分階段培養學員口譯能力，通過動態調整路徑圖構造，直接對接受訓方需求，並為推薦人才、善用人才、定制教學內容提供依據。

4.4 第四次：成果

“成果”層面主要考察受訓者的行為改變是否對所屬組織產生了

圖六 以學員能力發展路徑為導向的口譯培訓模式



影響。本次培訓主要達成兩項成果：為院方選拔和儲備口譯人才以及制定進階培訓計劃。

培訓方講師團隊通過課堂觀察學習和演練質量，逐份檢視中、後期測試考試音頻，並基於能力發展路徑圖反應出的能力和意願這三大方面作為推薦人才儲備的證據，向院方推薦了以能力突出、承擔口譯意願強烈的核心口譯人員為主力的口譯人才。未來將形成“核心口譯人員+各層次備戰人員”的梯隊，備戰人員經過進階學習，逐步納入及擴大核心團隊。

為進一步拓展受訓醫療人員口譯能力，因應醫院國際化發展趨勢，受訓方與培訓方正在規劃進階培訓課程。醫療口譯人才養成並非一蹴而就，且受限於該項目目前進度，我們將進行長期跟蹤觀察，收集數據與資料，進行後續分析研究。

五、結論

本研究運用柯氏模型從“反應”、“學習”、“行為”和“成果”四個層次對本次口譯培訓的效果進行了評估，著重分析前三個層次。證據表

明，在“反應”層面，受訓學員及利益相關之院方代表對本次培訓的課程安排、內容講解和講師表現的滿意度高。在“學習層面”，學員能夠通過培訓掌握口譯的理論知識、基本策略和技巧，從口譯零基礎到能夠在測試中主動運用所學。在“行為”層面，通過繪制能力發展路徑圖，使學員瞭解自身能力發展階段，為院方委派口譯任務提供依據，為未來課程規劃提供參考；學員在訓後形成良好的口譯學習氣氛。在“結果”層面，透過本次培訓，利用綜合手段為院方發掘、推薦人才，為院方善用人才提供了良好基礎。實踐表明，柯氏模型能夠應用在教育訓練的效果評估中，對訓練品質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科學評估。

藉由培訓效果分析，本研究提出以“學員能力發展路徑”為導向的培訓模式。經本發展路徑，本研究確立了針對醫療人員培訓的能力及其發展階段，並將學員能力發展各階段具體化、視覺化，同時將培養目標定制化、動態化，靈活對接院方需求。

一直以來，翻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職業譯者（Gile，2009）。本培訓擴充了翻譯教育的教學對象，翻譯教育的目的也得到擴展，從培養職業譯者擴展到透過培訓賦予具有良好語言基礎的專業人士翻譯能力。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經過培訓，醫療人員擔任口譯不僅能夠運用專業和完備的知識體系，更能夠在醫院國際化發展中發揮多元的作用。

本研究詳細闡述了培訓的內容、實施和評估，並對施訓和評估過程中的要點加以強調，以期為類似培訓提供參考。所引入之評估模型能夠對培訓效果進行多層次評估，彌補了既往醫療人員口譯訓練研究中缺乏培訓效果評估的不足。

本研究是針對醫療人員之口譯培訓系列研究之一，研究者還將對學員進行長期追蹤，以評測學員能力之發展，以及培訓為醫院及社會所帶來的效益。

注釋

- [1] 國際醫療翻譯協會英文全稱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是台灣地區第一個以國際醫療及其翻譯口譯事業為核心的非營利為社會團體。協會透過國際醫療翻譯口譯等實務擴展及研習活動，促進國內外醫療機構之跨國交流及事業合作，並以提升台灣國際醫療之相關服務水平為宗旨。參考來源：<http://imtia.org.tw/page/about/index.aspx?kind=1>。
- [2] “人才發展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ATD）”，其前身為“美國訓練與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ASTD）”，是世界範圍內支持組織機構內員工知識和技能培訓的專業性組織。
- [3] 請參考注[2]。
- [4] 旁聽學員由於個人有手術、出差、學術會議等安排無法在報名截止日期前確認全程參加，因此正式開課時作為旁聽學員參與學習。
- [5] 2009和2017年版的EMT模型更加側重職場能力。但受訓學員已是該院醫護及醫管人員，因此本研究採取PACTE（2003）翻譯能力描述作為評估基準。
- [6] 計算方法：所有項目共被選中123次，首先去掉一個項目最多答案（12項）和一個項目最少的答案（1項），然後用每個選項被選中的次數總和+總人數（23），四捨五入到整數。 $123 \div 23 = 6$ 。
- [7] 所有項目共被選中184次，計算方法同上。
- [8] 計算方法：選擇Excel菜單欄中“通過數據透視表匯總”，選擇整理好的項目和得分區域進行“計數求和”。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台灣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蘇志雄兼任副教授為本文的量化統計提供了方法和建議，特此向蘇教授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 侯闊（2011），〈美國醫療口譯的發展及對中國的借鑒〉，《中國科技翻譯》24.1: 24-28。
京報網（2016年11月10日），〈北京放開特需醫療服務等價格執行醫院自主定價〉，
取自http://www.bjd.com.cn/jx/toutiao/201611/10/t20161110_11044286.html
詹成、嚴敏賓（2013），〈國內醫療口譯的現狀、問題及發展——一項針對廣州地區醫療口譯活動的實證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3: 47-50。
中國新聞網（2015年11月14日），〈世界醫療旅遊與全球健康大會亞太博覽會在桂

- 林舉行) , 取自<http://www.chinanews.com/jk/2015/11-14/7623611.s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2016) , 〈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 , 取自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6/content_5088788.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 (2016) , 〈2016世界醫療旅遊與全球健康大會在博鰲舉行〉 , 取自http://www.cnta.gov.cn/xxfb/xxfb_dfxw/hn_1992/201606/t20160629_775762.shtml
- Abdulghani, Hamza Mohammad, Shaffi Ahamed Shaik, Nehal Khamis, Abdulmajeed Abdulrahman Al-Drees, Mohammad Irshad, Mahmoud Salah Khalil, Ali Ibrahim Alhaqwi & Arthur Isnani (2014). "Research Methodology Workshops Evaluation Using the Kirkpatrick's Model: Transla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Medical Teacher* 36.Suppl 1: S24-S29.
- Arthur Jr, Winfred, Winston Bennett Jr, Pamela S Edens, & Suzanne T Bell (2003).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in Organizations: A Meta-analysis of Design and Evaluation Featur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2: 234-245.
- Bates, Reid (2004). "A Critical Analysis of Evaluation Practice: The Kirkpatrick Model and 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7.3: 341-347.
- Beardwell, Julie & Tim Claydon (2014).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Curran, Vernon R, & Lisa Fleet (2005). "A Review of Evaluation Outcomes of Web-based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Medical Education* 39.6: 561-567.
- Gile, Daniel (2009).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Vol. 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Goldstein, Irwin L. & J. Kevin Ford (2002). *Training in Organizations: Need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Kirkpatrick, Donald L. & James D. Kirkpatrick (2009). *Evaluating Training Programs: The Four Levels*.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 Kirkpatrick, Donald L (2006). "Seven Keys to Unlock the Four Levels of Evalu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45.7: 5-8. doi:10.1002/pfi.2006.4930450702
- Kirkpatrick, James D. & Kirkpatrick, Wendy Kayser (2016). *Kirkpatrick's Four Levels of Training Evaluation* (1st ed.). VA: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 Meyer, Bernd, Kristin Bührig, Ortrun Kliche, & Pawlack, Birte (2010). "Nurses as Interpreters? Aspects of Interpreter Training for Bilingual Medical Employees". In Bernd Meyer & Birgit Apfelbaum (Eds.), *Multilingualism at Work: From Policies to Practices in Public, Medical, and Business Settings* (pp. 163-18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Moreno, Maria R, Regina Otero-Sabogal, & Jeffrey Newman (2007). "Assessing Dual-role Staff-interpreter Linguistic Competency in an Integrated Healthcare System".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2.2: 331-335.
- Nápoles, Anna M, Jasmine Santoyo-Olsson, Leah S Karliner, Steven E Gregorich, & Eliseo J Pérez-Stable (2015). "Inaccurat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Medical Encounters of Spanish-speaking Latinos". *Medical Care* 53.11: 940-947.
- PACTE (2003).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In Fabio Alves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pp. 43-6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2005).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a* 50.2: 609-619.
- Rafiq, Mehwish (2015). "Training Evaluation in an Organization Using Kirkpatrick Model: A Case Study of PIA".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4.3: 152-161.
- Noe, Raymond A., John R. Hollenbeck, Barry Gerhart, & Patrick M. Wright (2015). *Fundamental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 Torrington, Derek, Laura Hall, & Stephen Taylor. (2008).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ew Jersey: 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 Tschurtz, Brette A, Richard G Koss, Nancy J Kupka, & Scott C Williams (2011). "Language Services in Hospitals: Discordance in Availability and Staff Use". *Journal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56.6: 403-418.
- Vizeshfar, Fatemeh, Marzieh Momennasab, Shahrzad Yektatalab, & Mohamad Taghi Iman (2017).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 First Aid Health Volunteers' Training Programme Using Kirkpatrick's Model: A Pilot Study". *Health Education Journal* 77.4: 001789691774114.

作者簡介

郭聰，台灣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醫療翻譯人才培育、醫學翻譯、法律翻譯、語料庫與翻譯研究。電子郵件：celia21022@foxmail.com

楊承淑，台灣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口譯研究、譯者研究、國際醫療口筆譯研究。電子郵件：001652@mail.fju.edu.tw

張昆松，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主任醫師。研究方向：醫學教育。

尹瑩，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研究實習員。研究方向：醫學教育。

匡銘，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研究方向：醫學教育。

透過翻譯現象深化文學關係研究

——再論亞瑟·韋利和王際真在
《紅樓夢》英譯中的“夢境”之爭

江帆

Abstract

An Intertextual Approach to Literary Relations: Rethinking Arthur Waley and Wang Chi-chen's "Dream Controvers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Honglouloumeng* (by Jiang Fan).

In his Preface to Wang Chi-chen's English adaptation of Honglouloumeng published in 1929, Arthur Waley regrets that Wang has omitted many of the dream accounts, in which "as an imaginative writer Tsao Hsueh-Chin rises to his greatest heights." However, Wang disagrees with Waley on the literary value of such dream scenes in Honglouloumeng and insists on his own scheme of abridgment in a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in 1958.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noticed their disagreement and launched some initial discussion in her doctorate thesis in 2007. While starting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author, some recent scholars inspired by Orientalism tend to further interpret Waley's preface as "cultural hegemonism" and "Western prejudice", an assumption merely based on his identity as a British sinologist but not supported by any intertextual evidence.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dream controversy" more pertinently, the author furthers her initial findings via intertextual

analyses of Waley and Wang's related works revealing their poetic preferences and through other sources like biographies, diaries, correspondence, commentaries and research articles, uncovering the multifold factors underlying their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dream accounts.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article aims to rethink the applicability of Orientalism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refine the Polysystem hypotheses by introducing more detailed scenarios observed in this case, and propos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complexity, richness and multi-layered feature of literary relations via translation studies.

一、“再論”緣起：韋利和王際真的 “夢境”之爭及相關討論

1.1 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節譯本及韋利序言

1929年，王際真(Wang Chi-chen)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由紐約的達波德·多倫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和倫敦的勞特裡奇公司(Routledge Ltd.)同時出版，書名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譯本共有39章，371頁，共分三卷，前兩卷包括原書前五十七回的內容，第三卷為第五十八回至一百二十回的概述。該譯本由亞瑟·韋利(Arthur Waley)作序(Preface)，由譯者王際真撰寫導言(Introduction)，是20世紀60年代以前英語世界主要流通的《紅樓夢》譯本。

王際真1929年譯本的出版，並非是一個偶然事件，背後還有著更為廣泛的歷史背景。一戰前後，美國計畫將東亞作為戰略重點之一，對中國相當關注，在對華政策方面作出種種友善之舉。^[1]自20年代起，美國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宣傳都逐漸增多；主流媒體的影響和暗示，也促成了公眾對中國題材讀物的興趣和要求。20年代後期到

30年代，多個與中國相關的協會和機構相繼成立，如華美協進會、遠東研究促進會、哈佛燕京學社等；數個重要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等，也在幾年間開始向這些機構注入資金。（江帆，2007；2014：90-91）

由此可見，20年代末的《紅樓夢》譯本，由美國本土的暢銷書出版社策劃、由庚款留學生出身的旅美華人王際真擔任譯者，可說是正當其時。然而，對於英美普通讀者的實際接受能力和欣賞趣味，書商和譯者都還處於摸索階段。在這種情況下，邀請文化名人作序，就成為首要的市場促銷手段。不僅如此，在亞非文學譯本和作品初涉英美市場之時，名人序言甚至可能對作品的命運起到決定性作用。例如，和韋利同為布魯姆斯伯裡（Bloomsbury Group）成員的福斯特（E. M. Forster），當時就曾應邀為許多印度作家和譯者撰寫過序言，使得其中一些人屢次被拒的作品最終得以出版（Henig 1974：79）。

在上述背景之下，韋利為王際真1929年譯本作序，對譯本的推廣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1929年6月2日《紐約時報》登載的譯本書評，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本書由紫式部《源氏物語》的天才譯者亞瑟韋利作序”（New York Times 1929），首先就將序言作者韋利推出，並未提及作者和譯者。由此可見，韋利序言的確是提高譯本知名度的有效手段。

1.2 韋利與王際真的“夢境”之爭以及筆者的初始研究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也正是在其序言之中，韋利的觀點與譯者王際真的實際取舍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二人對於“夢境”不同看法。王際真在節譯中刪掉了《紅樓夢》中的許多夢境描寫，韋利卻認為，“正是在夢境描寫中，曹雪芹達到了他作為虛

構作家的最高境界”(Waley 1929b: xi)。韋利對於夢境是如此執著，乾脆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的立場，在序言中翻譯出原著第五十六回賈寶玉夢見甄寶玉的場景，這段譯文在其7頁的序言中佔據了兩頁多的篇幅(Waley 1929b: xi-xiii)。值得強調的是，近三十年後，當王際真在1958年出版自己第二個《紅樓夢》英譯本時，儘管篇幅已擴充為1929年譯本的兩倍，他仍然沒有按照韋利的觀點譯出上述夢境描寫，而且還在導言(Introduction)中專門以上述“賈(假)寶玉(Chia [fake] Pao-yu)”和“甄(真)寶玉(Chen [true] Pao-yu)”相遇的夢境為例，表達了針鋒相對的意見——“我刪掉了一些夢境，比如寶玉遇到另一個寶玉的夢”，王際真認為這些夢境和小說中的詩歌一樣，冗長無趣，不過是文字遊戲，不必譯出，“儘管對於其他人，甚至是某些我相當尊重其品味的人來說，這些內容似乎很妙”(Wang 1958: xx)。由此可見，韋利的意見不但在當時沒有起到作用，在三十年後更遭到了譯者的明確反對。

在同一譯本系統內部出現如此不同的聲音，是較為罕見的翻譯現象。筆者在10年前的博士研究中，首次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觀察和描述。並對二人的做法進行了初步的解釋：“亞瑟·威利……以後期象徵主義的詩學標準為標準，來品評《紅樓夢》中的夢境描寫。然而，王際真卻將這些超自然的描寫當作中國舊小說的陳腐套路，不肯多加保留……這多少反映出一位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華人知識份子的潛在立場”(江帆，2007；2014: 85)筆者基於對韋利序言、王際真導言，以及譯本實際呈現情況的觀察，對這一爭論進行了描述和初步解釋；但對於韋利推崇象徵主義詩學標準、王際真秉持啟蒙立場的深層動因，還未及進行更為深入的挖掘，因此也留下了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1.3 近年的幾種後續討論及研究舛誤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也關注到了這一現象，他們大多援引筆者的研究，並以此為基礎，對韋利的序言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發現和見解（王鵬飛、屈純，2010；楊芳，2012；唐均，2012；楊柳，2016）。在這些後續討論當中，楊柳對於韋利序言的解讀，尤其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她認為韋利對《紅樓夢》夢境描寫的推崇、對繁瑣生活細節描寫的反感，都具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和“歐洲中心式的傲慢和偏見”，並由此得出以下結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序者所採用的‘東方主義’價值體系和西方詩學標準，以及他在對待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時表現出的傲慢與偏見”（楊柳，2016: 12）。

在對中西譯者的差異進行探討時，套用“東方主義”理論，確實十分方便和現成。上述結論其實代表了國內翻譯研究界的一種傾向，即不加區分地用“東方主義”、“文化霸權主義”來評判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解讀。需要引起警惕的是，這種機械的套用，常常會得出與具體事實不符的結論，也會遮蔽和錯過許多更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回到楊柳的論斷，韋利以一個面目模糊的“西方人”身份，承擔了“歐洲中心式的傲慢與偏見”的罪名，而具體歷史語境下的具體問題，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挖掘和解釋。“傲慢與偏見”的指控，不僅距事實很遠，也在製造著更多的隔閡和偏見。除了上述激烈的指控，還有一些結論看似中立，其實也與事實不符。例如，楊芳（2012: 120）認為，“序言的缺陷是……未能將王際真翻譯的異化特色與韋利自身的歸化特色所造成的譯本差異做出合理的解釋”——這是作者在“東方主義”的預設之下，所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結論，無論是序言中二人的觀點、還是王際真譯本的實際呈現形態，都與這一結論並不符合；不僅如此，脫離歷史語境討論“歸化”和“異化”，亦無助於揭示這場爭論的核心與實質。

1.4 重回歷史現場，再論“夢境”之爭

為了糾正上述後續研究所產生的偏差和舛誤，筆者深感有必要重回歷史現場，再論韋利和王際真的“夢境”之爭，對這一翻譯現象做出更貼合歷史語境的解釋。通過大量歷史文獻的細讀和互證，我們發現以下事實：（一）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對《紅樓夢》的品評，與他評論同時代英語主流原創文學時所持的標準和措辭，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這就推翻了“歐洲中心式的傲慢和偏見”的指控。（二）韋利在譯序中對《紅樓夢》中某些文學元素的青睞，與其在私人文學活動中的一貫偏好高度吻合。韋利的詩學偏好既是私人的，也是社團性的：布魯姆斯伯裡團體作為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的實驗場，代表了一戰後動盪中的英語文學系統對新形式的渴求；韋利作為其中一名低調而影響至深的成員，促成了新文學形式庫的生成。（三）在避免了“東方主義”預設的幹擾之後，可以更平等地看待韋利和王際真對《紅樓夢》所進行的解讀。事實上，在二人之中，反而是華人王際真更多地採取了啟蒙知識份子的立場，基於現實主義文學標準，對《紅樓夢》的內容進行了評價和取捨，這一詩學標準的確立，實際上是同樣處於動盪和轉折期的源語文學系統在汲取外來詩學元素、“為我所用”之後，進而返照自身的結果。（四）韋利和王際真的翻譯論爭，遠遠超越了簡單寬泛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以及“意識形態”之爭，在當事人最純粹的個人詩學訴求背後，隱現了他們各自所屬的文化圈在危機與轉折期的相互期待和渴求。值得注意的是，翻譯所涉兩種語言所在的文化圈同時遭遇危機動盪或轉折期，並互有需求，這在翻譯史上是較為特殊的情形。對於這一特殊情形的討論，也引導我們對於多元系統假設的相關預測進行反思和補充。在以下章節，我們將對上述發現進行條分縷析的論證。

二、並非“傲慢與偏見”：亞瑟·韋利序言的互文性解讀

2.1 並非“東方主義者”：韋利在序言中凸顯的文化身份

首先必須指出，“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是20世紀最具生命力和適用性的批評概念之一，對於西方文學文化系統中東方話語的生成方式，提供了具有極強解釋力的敘事框架；而“東方主義者 (Orientalist)” 則是建立在這一核心概念基礎上的身份描述。在薩義德 (Edward Said) 看來，“西方人關於東方的觀念” 和“真實的東方” 之間永遠存在著差距 (Said 1979: 3, 5)。由此，西方人一旦言說東方，就天然地具有了“東方主義者” 的身份及原罪，因為“西方對於東方的任何公平合理的再現，都有其局限性” (Hayot 1999: 516)。在相應的批評話語體系中，西方國家的東方學者和文學翻譯者，因其職業和學術身份，會更多地被冠以“東方主義者” 之名。例如，科恩 (Robert Kern) 就曾提出，“龐德的潛在事業是一名東方主義者” (Kern 1996: 155)。關於東方主義的精髓，薩義德曾有名言——“東方大抵是西方的一項發明” (Said 1979: 1)，翻譯家如韋利，“單槍匹馬地創造了英語公眾所理解的日本文學” (de Gruchy 2003: 2)，也就必然具有“東方主義者” 的身份。因此，我們在這裡不是要否認韋利的“東方主義者” 身份，而是要深入探討，在韋利的多重文化身份中，是哪一重、或哪幾重身份在這篇序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也就可以接近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即韋利對於《紅樓夢》的評價，到底是因其西方人身份所導致的“誤讀”、“傲慢與偏見”，還是出於更貼合其個人訴求和歷史語境的其他原因。

在關於韋利的大量研究、評論、傳記，以及回憶錄當中，人們對其多重文化身份時有論及。例如，美國漢學家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認為，韋利去世後，其文集的編纂者“沒有努力區分作為詩人、翻譯家、學者和個人的韋利，即使他的這些不同側面都是密不可分的”；他認為文集“忽視了韋利的學術身份”(Schafer 1971: 117, 118)，事實上，這也恰恰體現了一般公眾，尤其是“韋利崇拜者”對於韋利多重文化身份的關注和興趣，如“詩人”、“文體家”、“英語散文大師”、“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等等。韋利在普通公眾中的聲望，主要來自其翻譯作品，這些譯作被自然接受為英語文學的一部分，評論者直接稱“《源氏物語》和《猴王》，都是英語文學名著”(Holzman 1969: 209)，其很多譯作都有廉價袖珍讀本，也是各類讀書俱樂部書單上的常客(Teele 1969: 367)。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韋利不同於其他學院派的漢學家，而是在普通文學愛好者中具有較高的聲望。

王際真1929年譯本是由暢銷書出版社推出的節譯本，與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學術性譯本的性質截然不同，從出版商的視角來看，邀請韋利作序，正是要借重他在普通讀者中的聲望。回到韋利自身，他在序言中所凸顯的文化身份也主要是文化名人，並無意從漢學家的角度對譯本進行學術性的評點。同時代的評論家的一些說法，也可作為佐證：在進行文學翻譯時，韋利常常“有意隱藏自己的學者身份”(Teele 1969: 367)；在撰寫評論文章時，“韋利儘量避免賣弄學問，不想讓讀者感到他驚人的博學……只是摘取一些他自身感興趣的花朵”(Morris 1970: 69)。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韋利也正是這樣做的。

當然，序言開始，韋利作為漢學家的身份並未完全隱形，他簡述了中國小說在本國文學系統中地位的演化，也對《紅樓夢》脫胎於街頭說書藝術的特徵進行了介紹。然而，韋利對《紅樓夢》具體情節的評價和褒貶，只是“摘取一些自身感興趣的花朵”，因此具有強烈的個人特色。例如，他不喜歡曹雪芹筆下的日常生活描寫，“要不是傳

統小說有嚴格的框架結構，曹差一點兒就陷入錯誤的做法，對單調的實際生活進行太過細緻忠實的再現”，他最感不耐煩的，是“黛玉和寶玉的爭吵接二連三……在場景和用詞方面僅僅有著最細微的差別”

(Waley 1929b: xi)。韋利在此表達的觀點，就已經和譯者王際真的實際選擇產生了分歧——王際真在譯本導言中明確指出，“他（譯者）保留了表現寶玉和黛玉關係的幾乎所有描寫，他們兩人是小說中最重要角色”（Wang 1929: xx）。由此我們發現了韋利的一個重要個人偏好，也即他並不喜歡作者對於細節瑣事進行寫實性的描寫。

那麼，這種對於瑣碎的日常生活細節描寫的反感，是否就是“東方主義者”對於東方文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甚或“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啟蒙大敘事建構的東西方野蠻與文明、愚昧與理性、落後與進步的二元對立框架”？筆者通過探尋韋利本人的論著，來回答這一問題。韋利在東方學著作和文學翻譯以外的作品很少，然而事有湊巧，正在他給王際真譯本作序的1929年，他也給同時代英國作家菲爾班克（Ronald Firbank）的小說集撰寫了導言（Introduction），韋利的資深研究者烏裡（Marian Ury）曾指出，這是“韋利極為罕見的私人（文學）熱情的流露”（Ury 1976: 285）。韋利在文中盛讚了菲爾班克的“藝術革命性”（art revolutionary），並對當時的英國小說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抱怨“如今的小說中總是擠進一大堆的‘細節和瑣事’”，並以當時一部“嚴肅的、雄心勃勃的小說”作為例證——“若是用簡·奧斯丁的‘鏡頭’，會因為其瑣碎而至少切掉其中一半細節，又會因為其不體面而切掉剩下的一大堆細節”（Waley 1929a: 1-11）。引述至此，我們已經基本得到了問題的答案——韋利對於《紅樓夢》中的寫實主義特徵和生活細節描寫的反感，與他對同時代英國小說中“一大堆細節和瑣事”的抱怨，其實是高度吻合的，這就完全推翻了“歐洲中心式的傲

慢和偏見”的指控。韋利或可被稱為東方主義者，但其此處的價值判斷，卻並非來自“東方主義者”的視角。

通過細讀上述珍貴的文獻，並將其與同年王際真《紅樓夢》譯本序言對照，我們發現，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對《紅樓夢》的品評，與他評論同時代英語原創主流文學時所持的標準與措辭，都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楊柳的判斷——“從作序者對原著的評價和對譯本的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序者所採用的‘東方主義’價值體系和西方詩學標準”，在事實上是不成立的。不僅如此，通過“韋利極為罕見的私人（文學）熱情的流露”，可以看到，他個人對於同時代英語文學的主流，持有明確的挑戰、創新，甚至是革命性的態度——對於菲爾班克，韋利“是一個真正的熱切愛好者”（Ury 1976: 286），認為其“幾乎是英語小說中的唯一的印象派，他最早擯棄了現實主義的重負，現代的故事正是被這樣的重負給葬送了”（Waley 1929a: 1-11）。韋利對於“現實主義”的厭惡，對於菲爾班克及其所代表的全新文學形式庫的極度推崇，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他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對“夢境”描寫所表達的看法。

2.2 “夢幻之地”及其對現實主義的顛覆：韋利的個人詩學訴求及其根源

“有關韋利的研究常常受到阻礙，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注重隱私的人……他很少有關於他個人觀點的文章存留。”（Machiko 2004: 565）幸運的是，通過他同在1929年撰寫的兩篇序言的互證，我們已經明確知曉了他所拒斥的詩學標準及其表達方式：“現實主義的重負”與“細節和瑣事”；而他之所以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高度推崇《紅樓夢》的夢境描寫，通過相關文獻的解讀，其原因也已經呼之欲出。

在此，我們仍然將韋利為菲爾班克小說集所作的序言其作為

打開秘密城堡的第一把鑰匙。如前文所引，韋利在序言中明白表達了對寫實主義文學手法的反感。此外，他將菲爾班克稱為“英語小說中唯一的印象派”，以強調菲爾班克的“藝術革命性”。那麼，在英語文學的座標當中，菲爾班克的位置在哪裡？韋利如此欣賞的“革命性”，又表現在哪裡？後世文評家對於現代主義文學中各類“亞文類(subclasses)”的梳理，可以給我們提供較為客觀的參考：他們傾向於將菲爾班克作為開端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頹廢小說”(Decadent Novel)後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並認為“菲爾班克對這一文類(頹廢派小說)最顯著的貢獻是在小說的整體肌理中摻入奇幻世界的氣息”，他們指出，“菲爾班克的小說主要創作在1914到1926年之間，在他的小說中，我們發現奇幻的程度已經如此登峰造極，似乎遠離現實世界也不會有任何問題”(Long & Jones 1961: 248)。例如，他的兩部代表作*Prancing Nigger*(1924)和*Concerning the Eccentricities of Cardinal Pirelli*(1926)分別以海地和西班牙為背景，“雖然他給這兩個國家注入了可以辨認的特徵……，可與此同時，它們經過了某種變形，變得比‘一千零一夜’還要遙不可及”(同上)。換句話說，就是理所當然的奇幻之地，一個奇幻而內在自洽的美學世界。

後世文評家將菲爾班克作為“頹廢文學”後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並將“奇幻世界”作為其文學特徵的標籤；而同時代的韋利的評論，則最早發現和激賞了這些詩學特質。韋利認為菲爾班克最好的作品是《腳下的花朵》(*The Flower Beneath the Foot*)，故事最大的特點，就是發生在“想像中的王國(an imaginary kingdom)”，韋利對故事背景進行了自己的解讀：“准亞細亞風格的宮殿，(建築)風格介於拜贊庭和倫敦的貝爾格拉維亞之間”(Waley 1929a: 1-11)。這種穿越時空的混搭，特別典型地體現了一戰後人們“夢裡不知身是客”的荒誕。難怪三

十多年後的評論者認為，菲爾班克小說的荒誕和虛無感，是反映一戰後西方世界的“更好的一面鏡子”（Long & Jones 1961: 248）。

如此一來，韋利序言中的“夢境”問題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我們依靠相互關聯的歷史文獻，一步步破解了韋利反感寫實主義細節描寫的原因，發現了他對於“想像中的王國”和“夢幻之地”的青睞，落實了他對菲爾班克如此欣賞的具體緣由，此時再來看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的評論——“正是在夢境描寫中，曹雪芹達到了他作為虛構作家的最高境界”（Waley 1929b: xi），也就顯得如此順理成章。筆者在10年前所發現的，韋利在《紅樓夢》譯序中所體現的對於後期象徵主義文學的特殊青睞，也就有了紮實的、貼合歷史語境的解釋。後期象徵主義文學和頹廢文學，正是現代文學形式庫中同一分支的兩個名稱；菲爾班克的奇幻小說，接續了波德賴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王爾德（Oscar Wilde）自19世紀末所開啟的這一現代主義文類；而韋利對菲爾班克作品的激賞，不僅通過為其小說集作序而得到充分的表達，而且還迴響于同年他為王際真《紅樓夢》譯本所作的序言之中。

我們在上述發現的基礎上，再將問題繼續聚焦：韋利對於夢境描寫是如此執著，竟然在序言中翻譯出原著第五十六回賈寶玉夢見甄寶玉的場景，幾乎佔有了序言三分之一的篇幅，這一特立獨行的做法相當引人注目。再次引用烏裡的說法，這當然也是“極為罕見的私人（文學）熱情的流露”。事實上，與韋利、王際真同時代的《紅樓夢》德譯本的譯者庫恩（Franz Kuhn），同樣也認為，王際真刪去大量的“夢境”描述非常可惜，但是，庫恩所特別看重的是小說結尾處的“寶玉重遊太虛幻境”（Kuhn 1932: xiv）。而韋利為什麼在眾多夢境之中，唯獨對兩位“寶玉”相遇的夢境如此愛不釋手？我們回到韋利最

青睞的菲爾班克所代表的“頹廢小說”，這一文類在奇幻色彩的背景之下，還有一個反復出現的元素，就是“隱形的性變態主題（latent theme of sexual perversion）”，“頹廢小說”早期代表作、王爾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就是典型的例子。《紅樓夢》中兩位寶玉相逢的夢境，正是由於從鏡中觀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引起的夢魘，從夢境最初人與影的相互傾慕，到最後的恐慌與驚醒，正是在奇幻的夢境中暗含了“隱形的性變態主題”，以及同性相戀／自戀的潛在元素。這恐怕是韋利特別青睞這一夢境的具體原因。近年有研究者基於“韋利身份的三個側面……其社會主義主張、模糊不清的性取向，以及其猶太背景”，發現其對於“隱藏或創造出同性間的情欲”的題材有特殊興趣（de Gruchy 2003: 17, 35）。在後面的章節，筆者還將進一步通過布魯姆斯伯裡同人的日記、回憶錄等史料，對這一推論進行說明。

2.3 韋利背後的英語文學系統：以“布魯姆斯伯裡群體”為參照系

前文已反復論證，韋利個人的詩學偏好是頹廢主義／象徵主義文學，尤其是“夢境之國”、“奇幻之地”、“隱形的性變態主題”等文學元素。韋利的這一詩學訴求是非常私人化的，但亦並非只屬於他個人，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文學系統中具有強烈的革新意識的那一部分。韋利與他周圍的文學世界形成聯繫的一個重要的管道，就是通過和布魯姆斯伯裡群體的交往。因此，我們首先以這一文學團體作為參照系，來探討韋利私人文學活動與當時英語文學系統的互動軌跡。

眾所周知，“布魯姆斯伯裡”並不是一個有著明確文學主張的“流派”，而是以親緣、朋友，以及劍橋校友等關係為基礎，鬆散組合在一起的精英知識份子團體。由於這一團體在現代主義文學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與其相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在此我們刪繁就

簡，從佐哈 (Itama Even-Zohar) 所提出的文學形式庫 (repertoire) 這一概念來切入問題，關注布魯姆斯伯裡在英語文學史上所留下的主要印記。^[2] 回望其核心人物維吉尼亞·伍爾芙 (Virginia Woolf) 對英語文學形式庫的最大貢獻，可用以下關鍵字總結：現代主義 (意識流) 和女性主義。伍爾芙 1928 年出版的《奧蘭多》(Orlando)，正是其邁向女性主義寫作的里程碑。《奧蘭多》以奇幻故事為背景，以美少年的情感、變性和永生經歷作為隱喻，最終達成女性主義的訴求——不談主題，就文學形式特質而言，這部作品與韋利最青睞的“頹廢小說”有頗多相似之處。更值得強調的是，“她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明確表達了對韋利的感謝”(Hening 1974: 78)。乍看似乎出人意外，但回溯我們在前文的考證，韋利既然對“奇幻夢境”“隱形的性變態主題”等文學元素有著強烈的偏好，他對伍爾芙的創作有此影響，實在是太自然不過了。除了私人文學交流所產生的影響，還有研究者發現，韋利 1925 年《源氏物語》譯本中的源氏，由於“同時對兩性具有吸引力”，也正是伍爾芙 1928 年《奧蘭多》的人物原型之一 (Machico 2004: 567)。

對於韋利和布魯姆斯伯裡的關係，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位。一般認為，韋利“一直是布魯姆斯伯裡的週邊成員”(Hening 1974: 75)，關係持久但不緊密。這就更加說明，伍爾芙在《奧蘭多》序言中對韋利致謝，並不是對親密朋友的常規致意，而是有着明確的文學意義。如果將韋利算作布魯姆斯伯裡的一員，那麼他恐怕是文學觀念最為前沿和創新的同人之一了。這不僅表現為伍爾芙《奧蘭多》的創作直接受其影響，在其他同人的日記和回憶錄中，也有對其詩學觀念的直接和間接記錄。例如，自 1919 年開始與布魯斯姆伯裡有所交往的傑拉德·佈雷南 (Gerald Brenan)，就曾在其自傳《個人記錄》(Personal Records) 中指出，“韋利是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當中唯一能看到《尤利西斯》好處的人”

(Brenan 1975: 157)。而1923年伍爾芙曾寫信給佈雷南，承認“喬伊斯被低估了”(Nicolson & Trautmann 1978: 80)，可見佈雷南在喬伊斯問題上是公認較有發言權的。

再如，著名的奇幻諷刺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因為姻親關係而與布魯姆斯伯裡產生了聯繫。《傳奇與遺產：布魯斯姆伯裡日記數種》(Legend and Legacy: Some Bloomsbury Diaries)的作者發現，沃在日記中對布魯姆斯伯裡的核心成員頗有微詞，“克勞德借給我一本伍爾芙的小說，但我拒絕認為這是部好作品”，“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 伍爾芙的姐夫，筆者注)喜歡自我吹捧”；而根據其日記，在他接觸到的所有同人中，“亞瑟·韋利是讓他想起布魯斯姆伯裡的人”(Chase 1987: 232)。我們發現，沃對韋利的認同並非出於偶然，而多半出於內在的詩學觀的契合——數十年後評論家在列舉後期“頹廢小說”代表人物時，沃的名字緊隨在韋利最為推崇的菲爾班克之後出現(Long & Jones 1961: 248)。

韋利個人詩學觀念的表述非常罕見，除了他在菲爾班克作品序言等極少數“表達個人觀點的文章”有所表達，常常是在純粹的私人交流中被人記錄下來。其文學創新觀念在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當中走在最前列，對伍爾芙文學觀念的轉變產生直接影響，這恐怕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韋利的翻譯活動和他的私人文學活動是基本分開的，後者低調但並不私密，只是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這也是本文重點進行鉤沉和考察的內容。當然，談到韋利對於英語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的貢獻，其翻譯活動也是不能忽視的。與龐德刻意改變英文句法的翻譯方式不同，韋利的翻譯“優雅而明晰”“仿佛用英語寫成”(Simon 1967: 271)，形式較為保守，但他所選擇翻譯的內容卻體現出他特殊的詩學追求。如本文所考證，當韋利為王際真《紅樓夢》譯本作

序時，將兩位美少年相遇的夢境盡情譯出，其實就隱晦地顯示出他對此類文學元素的由衷喜愛。此外，韋利正式發表的譯作，儘管在語言上屬於維努蒂 (Lawrence Venuti) 所說的“透明翻譯”，但其引進的全新內容元素，也在事實上促進了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的更新。正如有學者在談及《源氏物語》時所指出的，“翻譯作品的主角竟帶來了英國文學中的範式轉換” (Machiko 2004: 567)。

根據以上考證結果，我們將韋利、布魯姆斯伯裡，以及當時他們所在的英語文學系統納入視野，縱觀三者的相對位置和關係：(1) 布魯姆斯伯裡在20世紀初的英語文學系統中具有很高的聲望和影響力，其中的新銳成員對現代主義實驗文學形式進行了種種探索，這些創新的實驗文學形式獲得評論界的廣泛認同，居於文學系統的中心地位。(2) 在布魯姆斯伯裡同人中，韋利的詩學觀念尤為前衛：其翻譯作品和個人詩學觀念，促成了伍爾芙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的轉向；而與其他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相比，韋利對喬伊斯等人的現代主義文學表達方式，亦表現出罕有的鑒賞力。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較為準確地指出，在韋利為王際真1929年譯本作序前後，英語文學的主流，存在著較為強烈的革新意識和外向渴望，而韋利本人正是這一潮流中的前沿人物。

處於文學系統中心位置的文學團體和個人，普遍開始改變舊有文學觀念，樂於接受外來文學形式的影響。如果我們引入佐哈的“多元系統假設”對這一情形進行探討，會發現這恰恰與其假設中的“轉折點”相一致——“多元系統內部的運動機制會產生一些轉折點……導致本土存儲的文學內容不再被接受”，結果是“國外模式很容易滲透” (Even-Zohar 2000: 194)。這也就是韋利如此激賞《紅樓夢》中夢境描寫的實質——他並非是在“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評判原著，而是在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演進的過程中，作為一個詩學觀念較為激進的個

體，同時也代表了“一戰”以後轉折時期的英語文學系統，產生對外渴求的一種表現方式。

如果說英語文學系統處於“轉折點”，那麼另一端的中國文化，則處於更為複雜和動盪的革新時期。這無疑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在此，我們基於佐哈的假設，進行進一步的思考——當翻譯所涉兩種語言所在的文化圈如果同時遭遇危機或轉折，並互有需求時，翻譯產品又會呈現怎樣的樣貌？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在對於韋利的觀點進行詳盡考證之後，對譯者王際真的立場和選擇，也需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下進行還原。

三、韋利和王際真之爭的本質： 轉折時期文學形式庫的外向需求與錯位

圖裡 (Gideon Toury) 曾經指出，“翻譯文學只與譯語文學系統相關”(Toury 1984: 19)。談到翻譯文學所發揮的作用，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翻譯文學產生的過程中，如果參與其中的譯者來自源語文化，即使其主要意圖是迎合譯語讀者的需要，也還存在一個譯者是怎樣認知和看待自身母語文化和所譯作品的問題。換言之，譯者認為源語作品具有怎樣的價值、在哪些方面符合譯語讀者需要，都影響著他本人在翻譯中的選擇和取舍，也影響着翻譯產品的實際呈現方式；而這些看法的生成，其實都仍然離不開他自身所處的文化土壤。具體到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譯本由美國本土的暢銷書出版社發起，王際真本人也在導言中反復表示，他時時在考慮“英語讀者群體”的需要 (Wang 1929: xx)。然而，在內容選擇和刪節方面，他卻並未與同時代西方讀者的愛好完全達成一致。至少對於韋

利、庫恩這兩位西方譯者/讀者對原著夢境描寫的高度推崇，他始終並不認可。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3.1 王際真譯本對“夢境”的實際處理，及其對韋利序言的回應

我們首先來看王際真1929年譯本對於原著中夢境的實際處理方式。王際真在譯本導言中說明，他翻譯所依據的底本是1922年上海同文書局版的《紅樓夢》，屬於程高本系統（Wang 1929: xix-xx）。我們經過對圖書出版資訊的考察，發現同文書局民國11年（1922年）所出《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為王希廉評本，確屬程本系統。兩相印證，我們可以確認，王際真翻譯的紅樓夢底本為程高本。因此，我們首先對程本系統《紅樓夢》中出現的夢境（以及類似夢境的幻覺）梳理如下：夢境共計24次，前80回12次，後40回12次，後40回出現夢境的頻率是前80回的2倍。其中情節比較完整的夢境共有11次；除此之外的13次，都是夢境的零碎片段描寫或事後轉述。

王際真1929年譯本對上述11個完整夢境的處理如下：有情節譯出的共6次（前80回5次，後40回1次）：即第一回甄士隱的夢境（Wang 1929: 9）、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同上：43-48）、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王熙鳳（同上：92）、第六十六回柳湘蓮夢見尤三姐（同上：283-284）、第六十九回尤三姐托夢尤二姐（同上：295）、第八十二回黛玉夢魘（同上：304-305）；有概述但無具體描寫的有2次：即第九十八回寶玉夢入陰司尋找黛玉（同上：347）、一百十三回王熙鳳病中夢冤魂索命（同上：361）；未譯出的有3次：即第二十四回小紅夢見賈芸、第五十六回寶玉夢見甄寶玉、第一百十六回寶玉夢回太虛幻境。

至於零碎出現或轉述的11次夢境，有翻譯或概述的共5次：第十二回賈瑞夢入風月寶鑒（Wang 1929: 82）、第三十四回賈寶玉挨打後

夢見蔣玉菡和金釧兒（同上：183-184）、第三十六回賈寶玉夢中罵“金玉姻緣”（同上：190）、第八十九回林黛玉夢中聽見人叫“寶二奶奶”（同上：310）；第一百一回王熙鳳幻覺見秦氏（同上：349）。未譯出的有8次：第十六回秦鐘臨死前夢見判官小鬼、第七十二回鳳姐自述夢見太監奪錦、第八十六回賈母夢見元妃、第八十七回妙玉打坐時出現幻覺、第九十三回包勇轉述甄寶玉夢境、第一百十回鴛鴦自縊時幻覺見秦氏、第一百十七回櫛翠庵道婆夢見妙玉被殺、第一百二十回賈雨村夢見空空道人。

王際真譯本對夢境描寫的保留與刪除，是與他在導言中說明的內容選取原則基本一致的：1）“譯者沒有省略任何與故事主要發展有關的內容。他包括了幾乎所有表現兩位主要人物——寶玉和黛玉之間關係的內容”（Wang 1929: xx）。對譯者所呈現的主線故事情節有推動作用的夢境，一般都有所呈現，例如，與寶黛關係發展有關的夢境（包括夢境片段）、鳳姐相關情節（包括尤氏姐妹、賈瑞）的夢境都有翻譯或概述。2）“他也試圖包括表現中國特色的風俗習慣的情節和內容，例如秦氏的豪華葬禮”（同上）。由於譯本突出了秦氏葬禮，多次與秦氏有關的夢境和幻覺也基本全部保留。3）“第一回幾乎全部直譯，希望讓英語讀者感受到一點兒中國小說家的創作手法，題為‘序曲’，如果急於進入故事的讀者可以跳過這一部分”（同上）。第一回甄士隱的夢境得到了充分的翻譯。4）“自然地，前八十回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處理”（同上）。有完整情節的夢境，前80回譯出了5次，後40回僅1次。

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當王際真在1958年出版自己第二個《紅樓夢》英譯本時，儘管篇幅已擴充為1929年譯本的兩倍，他不僅仍然刪掉了後40回中的絕大多數夢境描寫，對於韋利所特別欣賞的寶玉夢見“另一個自己”的夢境，他也仍堅持刪除掉了。儘管這一夢境發生

在第五十六回，而王際真一再說明自己很重視前80回情節的。不僅如此，王際真還在譯本導言中特別表達了針鋒相對的意見——“我刪掉了一些夢境，比如寶玉遇到另一個寶玉的夢”，王際真認為這些夢境和小說中的詩歌一樣，冗長無趣，不過是文字遊戲，不必譯出，“儘管對於其他人，甚至是某些我相當尊重其品味的人來說，這些內容似乎很妙”（Wang 1958: xx）。

3.2 王際真的文化觀、詩學觀及其產生由來

如前文所言，在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中，即使發起和主導翻譯行為的主體是譯語國家的出版機構，但如果譯者來自源語文化系統，那麼儘管譯者與出版機構在意圖上高度一致，其翻譯選擇還是會在某些方面顯現出其自身成長的文化土壤的痕跡。以王際真1929年譯本和後來的修訂本為例，他在主觀上是極力迎合譯語讀者的：為方便英美讀者，他對原文做了大量的刪節，“刪去了成千上萬的不必要的字詞”（Wang 1958: xix）；在語言上，“將原文的章節都翻譯和改變為當代英語作品……就如原作一般口語化”（Van Doren 1958: v）。然而，在內容選擇上，王際真雖然認為自己所譯出的都是“西人所欲知者”，但是一些“西人”卻提出了異議，不僅韋利在譯序中惋惜他刪掉了許多夢境，德譯本的譯者庫恩也認為，“他捨棄了很多對西方讀者來說極其有趣的細節……例如小說結束前出現的宏大的夢境……這是小說所達到的文學頂峰之一，是不可或缺的”（Kuhn 1958: xiv）。此外，許多評論者對王際真節選翻譯前80回內容、壓縮概述後40回內容的刪節方式感到不滿，認為造成了敘事節奏的前後失衡（Birch 1972: 201；Hawkes 1989: 268；姜其煌，2005: 138）。這些看法差異，其實都可追溯到王際真作為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的潛在立場。

在此，我們從王際真內容選擇的最後一條原則看起，“自然地，前80回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處理”（Wang 1929: xx）。在王際真看來是“自然”的選擇，卻在英語讀者眼裡看來很不自然，覺得他“不停地縮減文本，加快敘事速度”（Birch 1972: 201）。事實上，對於國外讀者而言，他們對於前80回和後40回的文學價值差異並不敏感，相反對於故事的完整性更為重視。而王際真基於胡適的考證，對前80回的內容特別重視，對後40回的內容則一帶而過，是“自然地”出自一般知識份子對於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文史研究成果普遍服膺的立場，卻並未考慮到西方一般讀者的期待。王際真在譯本導言中，除了對“胡適博士的詳盡研究”表示完全認同，認為其基於現實證據的科學考證遠勝清代索隱派的種種附會，還特別介紹了胡適的“新文學之父”的身份（Wang 1929: xvi）。

相應的，王際真的詩學觀也同樣打上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普通知識份子的烙印，不僅表現出明顯的啟蒙立場，還對現實主義文學手法表示特別的青睞。他所撰寫的譯本導言，標題即為“第一部中文現實主義小說”（*The First Realistic Novel in Chinese*）。筆者10年前的博士研究對此已經進行了觀察和描述，並結合歷史語境進行了初步解釋，認為“這多少反映出一位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華人知識份子的潛在立場，即使他的翻譯行為純粹針對英美市場，本質上與中國國內文學發展動向無關……上述立場仍然影響著他的選擇”（江帆，2007；2014: 85-86）。在此，我們通過對王際真同時期相關論述的發現和挖掘，進一步確認和說明上述結論。王際真在1929年譯本發表前後供職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同期發表的絕大多數文章均為各類文物的介紹，但亦有一篇珍貴而罕見的、專門論述“中國國內文學發展動向”的英語文章，題為“中國文學中的西方潮流”（*Western Tides in Chinese Literature*），恰能說明其詩學觀的由來。在這篇發表於1934年的長文中，王際真非常直接地聲稱，“高等

文明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迅速意識到其必須要麼接受西方文明，要麼滅亡”（Wang 1934: 128），啟蒙立場躍然紙上。對於新文化運動後湧現的文學社團及其文學理念，王際真首推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的藝術，也就是現實主義”，認為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是“最為廣泛閱讀的期刊”，也是“新文學作家的首要喉舌”（同上: 135）。對於韋利所推崇的象徵主義，以及頹廢小說，王際真恰好在文中都有所提及——他認為創造社“販來了陳舊的象徵主義”（trafficked in shopworn symbolism）；而說到頹廢小說的影響，他特別強調在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轉向了為藝術而藝術”，對於這一現代主義的文體分支頗有微詞（同上: 135-136）。這些論述所體現出的立場，正好可以說明他與韋利產生分歧的根源。很明顯，他所認為的“西人所欲知者”，也即他所認為能夠代表《紅樓夢》精華部分的中國文學、文化內容，是原著通過寫實主義手法所呈現的“故事發展”和“中國特色的風俗、習慣”；至於韋利所盛讚的“達到文學頂峰”的夢境描寫，他並不以為然。由其上述長文作出的價值判斷可知，王際真如此推崇現實主義文學觀，並非他對於現代主義和頹廢文學一無所知，而正是舊有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被取代之際，大多數普通知識份子在接受大量西方詩學元素、進行自然篩選以後，普遍所做出的選擇。下文我們還將對此進一步進行論述。

3.3 夢境之爭的實質：轉折期文學形式庫的外向需求與錯位

從王際真兩版譯本導言的字裡行間，我們已發現其新文化知識份子的立場，而與其第一版譯本同時期發表的長文，則對此提供了更清晰的解釋和佐證。王際真的詩學立場並非憑空而來：在文化觀上，他認同胡適所代表的新文化精神，對其《紅樓夢》考證成果完全接受（Wang 1934: 132；Wang 1929: xvi）；在文學立場上，王際真高度認

同“為人生的藝術，也就是現實主義”（Wang 1934: 135）。我們將王際真的長文與韋利序言作比，發現王際真本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學形式的“滯後”，進行了遠比韋利更嚴苛的指摘（Wang 1934: 127, 128）。由此可見，楊柳在其研究中對所謂韋利“居高臨下的啟蒙立場”的指控，可謂是弄錯了對象——在西方漢學家韋利和華人譯者王際真當中，反而是後者更多地採取了激進的啟蒙知識份子立場，將西方現實主義詩學作為最高標準，對《紅樓夢》的內容進行了評價和取舍。王際真如此推崇現實主義文學觀，並以其為標準來取舍傳統文學經典內容，正體現了五四前後中國大多數普通知識份子面對大量西方詩學元素湧入時的自然選擇：他們在源語文化遭遇劇烈的動盪和危機之時，強烈感受到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在文學閱讀、欣賞，甚至創作中，多數更傾向於“為人生”的現實主義；並進而常常以這一詩學觀返照自身、對自身文學傳統進行闡釋。

而反觀前文所詳盡分析的韋利序言，卻恰恰並非是在“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評判《紅樓夢》。韋利對特定夢境描寫的青睞，乃至以序作者的身份所進行的翻譯，其實都呼應了他同年在菲爾班克作品集中所表達的“私人文學熱情”，恰恰表現了他對當時英語文學創作主流的解構和挑戰。不僅如此，即使以布魯姆斯伯裡這一現代文學形式庫的試驗場為參照系，我們發現韋利的個人文學觀也是其中特別具有革新意識和外向渴望的，伍爾芙、沃、佈雷南等布魯姆斯伯裡同人的序跋、書信、日記，都可作為有力的佐證。正如我們在前文基於文本考證所得出的結論，韋利在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譯本序言這一特定文本中所表達的立場，“是其在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演進的過程中，作為一個詩學觀念較為激進的個體，同時也代表了一戰以後轉折時期的英語文學系統，產生對外渴求的一種方式”，非但不是“歐洲中心主義”，而且還體現了明顯的“去中心”、“去傳統”意識。

綜上所述，韋利和王際真雙方的表現，其實都是當其所在文學系統處於震盪和轉折期、對外產生渴求時，他們作為處於各自文學系統內部不同位置的個體，基於其詩學觀而產生的反應。王際真推崇現實主義文學觀（這也是新文化運動前後多數中國普通知識份子的選擇），並以此為主臬來衡量原著內容的價值，在翻譯中擯棄了大多數具有超自然色彩、卻與情節走向關係不大的夢境描寫；而韋利則出於其個人對於後期頹廢小說的特殊偏好（如其本人所言，亦如前文所考證，代表了當時英語文學系統較前端的“革命性”渴求），對於《紅樓夢》原著中的某些夢境描寫表現出特殊的青睞。他們所代表的各自所在的文學形式庫的外向需求，一般並不會產生衝突和碰撞，但同時投射到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英譯本上，這種錯位於是被凸顯、感知出來，表現為二人對夢境描寫的截然不同的評價與取捨。這也就是韋利和王際真在《紅樓夢》英譯中的“夢境”之爭的實質。

四、研究思考與啓示

4.1 如何看待中西譯者的差異：細究歷史事實，慎用“東方主義”

如本文所考證，楊柳以“作序者所採用的‘東方主義’價值體系和西方詩學標準”來解釋韋利的立場及其和王際真的意見衝突，並不能揭示問題的真相。韋利在其同年撰寫的兩篇序言中，對本國當代文學和東方傳統文學中的寫實主義同樣厭棄、對兩者的奇幻夢境描寫同等讚譽，並未表現出任何“東方主義”和“西方中心”傾向；反而是王際真，明確表示“中國在靠近西方文學主流文學以前，其創造力因儒家理念已趨向停滯，前者也正是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勝利所帶來的結果”（Wang 1934: 127）；並借用馬克吐溫《在亞瑟王朝廷裡

的康涅狄格州美國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將中西文明間的差距比擬為“美國人與低級的中世紀烏合之眾的對比”

(同上: 128)。此時再回看楊柳對韋利的指控：“東西方空間意義上的不同被轉換為時間意義上的落後與先進、價值判斷上的低劣與優秀的差異”(楊柳, 2016: 11)，會發現，這恰恰是爭論的另一端、華人譯者王際真所為。楊柳的評論弄錯了方向，韋利在這場爭論中的立場，並不能被稱為東方主義者。

如本文所分析，一戰以後的十數年間，英語乃至歐洲的主流文學，正處於高爾斯華綏、羅曼羅蘭所代表的現實主義高峰向伍爾芙、喬伊斯所代表的現代主義轉變的潮流當中，被前者所推向極致的傳統西方中心價值觀，連同寫實主義的文學形式，都被詩學觀超前的韋利視為“現實主義的重負”，而具有現代主義特徵的奇幻夢境描寫，則無論時代和出處，都受到了韋利的青睞；而此刻正當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極盛、胡適提倡“重新估定一切價值”(a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之際，上述傳統的西方中心價值觀，反而被中國大量普通知識份子如饑似渴地加以吸收，並用以對自身的文學傳統進行顛覆、闡釋和取捨，王際真就是其中的典型。二人的詩學衝突在1929年《紅樓夢》英譯本序言的這一刻交匯之中顯現，且在對夢境描寫的取捨方面表現得分外突出。

與此同時，在類似翻譯研究個案中，不輕易套用“東方主義”來定義西方譯者，也是為了更細緻準確地對譯者在特定語境下的做法進行剖析。作為東方文學的知名譯者，韋利和龐德常常被評論者放到一起比較，還出現了“‘韋利是漢學家，而龐德是詩人’的簡單兩分法”(Teale 1969)。兩人之所有這樣的形象區別，主要是因為龐德的創作與翻譯融為一體，對於英語文學系統來說，充滿了異質性和實驗性，而龐德利用東方元素促成新的文學形式，也因其對東方元素的

“挪用”和“誤讀”而被公認為一類“東方主義者”的典型，這也是近年文學研究中“東方主義”和“現代主義”的主要聯繫點（Hayot 1999；Kern 1996；Qian 1995）；然而，韋利的大部分翻譯則以“優雅、透明”而著稱，與他前衛的、顛覆性的私人文學追求，基本是截然分開的，後者因其稀少的個人表達，已逐漸消弭在歷史的長河中了。幸運的是，通過對相關歷史文獻的互文引證，我們得以發現，不僅韋利個人的詩學追求較為前沿，不代表當時英語文學系統中普通讀者的趣味，而且，他對《紅樓夢》也不存在專門針對東方文學而進行的褒貶；更重要的是，他也並沒有如龐德一般，通過對東方元素的改寫和扭曲，來達成自己私人的現代主義詩學追求——這正是筆者不贊成套用“東方主義”批評話語來評判其觀點的原因，因為得出的結論不僅距離事實太遠，而且遮蔽了更多的“真問題”。

正是由於發現了“東方主義”在此例個案中的不適用性，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下問題：在類似翻譯現象的討論中，“東方主義”的機械套用，到底能揭示多少歷史事實？又是否能確切解釋具體歷史語境下的個人意圖？其先驗的立場和價值判斷預設，是否會阻礙更複雜因素的揭示？尤其是當許多西方譯者和漢學家在譯介中國文化典籍和文學作品的漫長歷程中做出重大貢獻，如果一味用“東方主義”對其行為進行預設和分析，是否卻忽視和失落了更重要的研究問題？進而言之，這樣的思路和論斷，是否有利於中國文學與世界的進一步交流？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慎重考慮的。

4.2 對多元系統假設的印證、豐富與補充

埃文-佐哈在其極富解釋力的多元系統假設中，曾經非常準確地總結和預見了以下規律：當某一文學多元系統處於“幼嫩”“邊緣”，或“轉

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的情況，翻譯文學往往會在文學系統中佔據重要地位，在對外來文學進行翻譯的過程中，傾向於保留外來文學中新穎的詩學形式；而較為強大、穩定、自足的文化，翻譯文學往往處於次要地位，就翻譯策略而言，則傾向於對自身固有的文學形式庫進行強化（Even-Zohar 2000）。後一種情況，是我們在談及英美文學系統對中國文學的譯介時，常常預設的情形；也是前文所述的楊柳、楊芳等研究，對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的立場所進行的預設。然而，根據我們的發現，韋利在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譯本序言這一特定文本中所表達的立場，其實並不完全符合這一預設，他對夢境描寫的青睞，乃至以序作者的身份所進行的翻譯，其實呼應了他同年在菲爾班克作品集中所表達的“私人文學熱情”，即不滿當時英國小說的主流，渴望文學形式的變革，並非“對固有的文學形式庫進行強化”。

如以布魯姆斯伯裡為參照系，根據韋利在系統中所處的位置，亦可以觀察到當時英語文學系統的整體態勢。如果遠距離觀察，或僅談相對位置，20世紀20年代的英美文學系統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文化系統相比，自然是更為穩定、強勢、自足的系統。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聚焦，則會發現，一戰前後的英美文學、文化系統，卻並非大而化之的“強勢文化”一詞就可囊括，而是處於明顯的轉折和危機當中。這一轉折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我們在上面所發現的，處於系統中心位置的文學團體和個人，普遍開始改變舊有文學觀念，樂於接受外來文學形式的影響，這恰恰與佐哈所描述的“轉折點”相一致。具體到韋利和王際真的“夢境”之爭，這也就是韋利這一端的立場和觀點所體現的實質。他對於《紅樓夢》中夢境描寫的偏好，並非是“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而是作為轉折期的英語文學系統中處於創新層面上的個體，產生對外渴求的具體表現方式。而在爭論的另一端，王際真作為華人譯者，

卻以激進的啟蒙立場對自身文學傳統進行顛覆、闡釋和取捨，這其實更像是楊柳所指控韋利的行為。如前所述，這其實是許多五四知識份子的普遍選擇——他們更傾向於“為人生”的現實主義；並以這一詩學觀對自身文學傳統進行取捨。王際真同期發表的長文即可作為佐證。

佐哈所提出的多元系統假設在古往今來的翻譯史中一再得到驗證。我們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當翻譯所涉兩種語言所在的文化圈如果同時遭遇危機或轉折，並互有需求時，翻譯產品又會呈現怎樣的樣貌？韋利和王際真的“夢境之爭”無疑給我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個案與標本。恰逢爭論雙方所屬的文化圈都處於動盪轉折之時，其固有的文學形式庫也都處於更新狀態，因此產生了看似訴諸他者、實則源於自身的外向需求。在兩種語言文化經由翻譯行為產生碰撞時，雙方需求產生了錯位，才最終導致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翻譯僵局。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一互為鏡像的階段雖然稍縱即逝、卻又切實存在過，對於我們印證、豐富和細化多元系統假設的情形設置，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多元系統理論中情形假設的細化，事實上也為我們考察當下文學譯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類似複雜情況進行了提示。在文化價值取向多元化、碎片化的今天，不同機構、個人合作實施翻譯項目的情況日漸普遍，對各環節產生影響的社會與個人因素同樣異常複雜。僅僅訴諸寬泛意義上的“中西文化”和“意識形態”衝突，以及文化的“強勢”與“弱勢”，往往並不能真正解釋翻譯現象的實質。重返歷史/現實語境、層層剖析事實及其相互關聯，是把握翻譯現象、預測翻譯規律的唯一途徑，也是真正意義上的系統/描述翻譯研究的應有之義。

4.3 譯介學視角對文學關係研究的深化：以翻譯衝突為起點

韋利和王際真雙方詩學標準的確立，實際上是動盪和轉折期的

源語文學系統在汲取外來詩學元素之後，“為我所用”的結果。這也正如學者有在談及當時中英文學關係時所指出的，“20世紀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對於新的異質文化的發現，同時激發了英國和中國知識階層的靈感，幫助他們進行自身的創新，並對舊有的文學遺產進行挑戰”（Sheringham 2006: 222）。現有的中英文學關係研究對於韋利也偶有涉及，主要見於新月派和布魯姆斯伯裡之間的交往記載。這類研究多以事實性的個人交往、通信的拾遺和鉤沉作為重點，尤其以徐志摩與曼斯費爾德、凌叔華與朱利安·貝爾、胡適與韋利的交往作為考察對象（Laurence 2003；董鼎山，2008；冀愛蓮，郭炳通，2010；趙毅衡，2018），其中涉及韋利的部分，多強調他在漢學研究中對胡適等中國學者的請教。而我們以中國文學外譯中的爭論現象作為研究起點，發現背後蘊藏的韋利及王際真的個人詩學追求，則不僅對文學關係表像下的實質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對於調整、豐富和細化現有翻譯理論中關於文化交流模式的預測和假設，都將產生更為積極的方法論意義。正如學者所言，“要揭示這種由各類文化關聯所形成的複雜網路”，除了要考慮到“東方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東西方關係中的盤剝和壓迫因素”，還需要“用更寬廣的筆觸來塗抹畫布”（Sheringham 2006: 222）。斯言誠是！此例個案給予我們的啟發，也正在於此。我們所採取的“更寬廣的筆觸”，就是將王際真1929年的《紅樓夢》英譯本序言作為核心文本現場，由此層層向外輻射，在相關歷史文獻的互文解讀中發現各方塵封於歷史的苦心孤詣，並對現象之間的關係進行更為深廣的探索。透過譯介學視角對史料進行參詳，文學關係的豐富性和層次性得以進一步凸顯，這不僅能夠對傳統的文學關係研究形成有效的補充，也往往是簡單套用“東方主義”的研究路徑所不易企及的。

注釋

- [1] 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對中國的友善舉動，參見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三聯書店1962年，第200-201、218頁。
- [2] Repertoire is conceived of here as the aggregate of laws and elements (either single, bound, or total models) that govern the production of texts.(Even-Zohar, 1990: 17)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模式研究”(項目號：12CZW095)及上海外國語大學青年教師科研創新團隊項目“高翻學院漢譯外研究團隊”的資助。

參考文獻

- Birch, Cyril (1972).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New York: Grove Press.
- (1959). (Review)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 3: 386-387.
- Brenan, Gerald (1975). *Personal Records*. New York: Knopf.
- Chase, Kathleen (1987). “Legend and Legacy: Some Bloomsbury Diarie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1.2: 230-233.
- Even-Zohar, Itamar (200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Routledge. 192-197.
- Even-Zohar, Itamar (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etics Today* 11.1: 9-26.
- de Gruchy, John Walter (2003). *Orienteering Arthur Waley: Jap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ayot, Eric (1999).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Meaning of Pound’s China.”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5.4: 511-533.
- Henig, Susanne (1974). “The Bloomsbury Group and Non-Western Literature.” *Journal of South Asian Literature* 10.1: 73-82.
- Hawkes, David (1989).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Holzman, D (1969). (Review) “A Bibliography of Arthur by Francis A. Johns.” *Young Pao* 55.1/3: 209-210.

- Kern, Robert (1996).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Kuhn, Franz (1958). "Introduction."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rans. Florence & Isabel McHug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xiii-xvi.
- Laurence, Patricia (2003).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 Long, Richard A. & Jones, Iva G (1961).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he 'Decadent Novel'." *College English* 22.4: 245-249.
- Machiko, Midorikawa (2004). (Review) "Orienting Arthur Waley: Jap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by John Walter de Gruchy." *Monumenta Nipponica* 59.4: 565-567.
- Morris, Ivan (1970).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New York: Walker & Co.
- New York Times (1929). (Review)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Times*. June 2: BR2.
- Said, Edwar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chafer, Edward H (1971). (Review)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Pacific Affairs* 44.1: 117-118.
- Simon, Walter (1967). "Obituary: Arthur Wal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30.1: 268-271.
- Sheringham, Michael (2006). (Review)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2: 220-224.
- Teele, Roy E (1969). (Review) "A Bibliography of Arthur by Francis A. Johns." *Books Abroad* 43.3: 367-368.
- Toury, Gideon (1985).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Theo Hermans. Beckenham: Croom Helm Ltd.16-39.
- Ury, Marian (1976). "The Imaginary Kingdom and the Translator's Art: Notes on Re-Reading Waley's Genji."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2: 267-294.
- Van Doren, Mark (1958). "Preface."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rans. Wang Chi-che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v-vi.
- Waley, Arthur (1929a). "Introduction." In *The Works of Ronald Firbank* (Vol. 1). Ronald

- Firbank. London: Duckworth.1-11.
- (1929b). "Preface."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rans. Wang Chi-che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vii-xiii.
- Wang, Chi-chen (1929). *Translati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 (1934). "Western Tide in Chinese Literature." *Pacific Affairs* 7.2: 127-138.
- (1958). *Translati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 董鼎山(2008),〈新月派與布魯姆斯伯裡——談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文匯讀書週報,7月30日。
- 冀愛蓮,郭炳通(2010),〈胡適海外漢學觀研究〉,《安徽史學》第3期:90-97。
- 江帆(2007),〈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2014),〈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姜其煌(2005),《歐美紅學》,北京:大象出版社。
- 唐均(2012),〈王際真《紅樓夢》英譯本問題駁論〉,《紅樓夢學刊》第2期:185-198。
- 王鵬飛,屈純(2010),〈承襲與超越的佳作——《紅樓夢》王際真譯本複譯研究〉,《紅樓夢學刊》第6期:61-78。
- 楊芳(2012),〈《紅樓夢》與《源氏物語》英譯史對比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116-123。
- 楊柳(2016),〈有色的西洋鏡,誤讀的《紅樓夢》——喬利、王際真《紅樓夢》英譯本序文研究〉,《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8-15。
- 趙毅衡(2018),〈布魯姆斯伯裡在中國〉, <http://www.britishlibrary.cn/zh-cn/articles/bloomsbury-and-china/> (accessed 20 June 2018)。

作者簡介

江帆,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副教授,《東方翻譯》雜誌編輯部主任。電子郵件:cherryjiang75@163.com

賈平凹小說《廢都》 在海外的翻譯與接受

孫會軍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Jia Pingwa's *Feidu* Outside China (by Sun Huijun)

Feidu, a novel by Jia Pingwa, which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ieces of fiction in China since 1993, has recently come back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its English version *Ruined City: A Novel in the US* in 2016.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receptions of the novel in China and i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France and America.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its translation, promotion and reception in America, through analyses of the para-text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such as the preface of the translator, the promotional words on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 publisher, the endorsement of literary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omments on it by critics. It is found that: 1. The novel was enthusiastically accepted and highly acclaimed in France and Japan, which constitutes a sharp contrast with its reception among Chinese readers and scholars; 2. It got a chance to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romoted to the readership 23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owing to the efforts of "different agents", among whom were the translator, the editor, the publisher and many influential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3. Howard Goldblatt, rather than others, was finally chosen as the translator of the book o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social, symbolic and

economic capitals he had amassed; 4. The state-sponsored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n America was part of China's effort of going global,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novel has met with obstacles, and its reception is not very satisfactory.

一、引言

《廢都》是當代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1993年出版，1994年被禁，也可以說是最具爭議的新時期小說。同時，它還是最受關注的新時期小說之一，因為小說雖然在國內遭禁，在日本、法國卻引起積極關注和熱烈反響；2016年1月22日英譯本在美國的推出，又一次將其引入公眾視野。本文擬從場域、資本以及行為人等翻譯社會學視角出發，對譯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翻譯的社會學視角借鑒了法國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因此有必要首先對布爾迪厄的理論作一簡單介紹。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布爾迪厄成為繼新批評、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以及解構主義之後文化研究中最主要的理論聲音。他的理論和新歷史主義、深層詮釋學等研究不謀而合，對社會、歷史重新產生了興趣，但是它又不認同傳統社會學的單一決定論（Bourdieu 1993: 1）。他提供的分析模式通過“慣習”（*habitus*）這一概念重新引入了被結構主義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的“行為者”（*agent*）的概念，却又不認同浪漫主義對於行為者（或曰創造者）的理想主義的看法（Bourdieu 1993: 2）。在布爾迪厄看來，“行為者”的所作所為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具體的、由一系列客觀的社會關係決定的社會語境下進行的（Bourdieu 1993: 6）。為了解釋這個語境，而同時又避免落入單一決定論的窠臼，布爾迪厄發展了

“場域”(field)的概念，通過“場域”的概念，將行為者的行動置于客觀的社會關係之中進行審視。場域有很多種，比如“知識場域”、“文學場域”、“政治場域”、“經濟場域”、“高等教育場域”或“宗教場域”等。場域最本質的特徵就是競爭，這也是場域得以形成、存在和發展的原動力。另外，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 2010)將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借用到翻譯研究中，將場域的概念從國內現象的分析挪用到國際層面，將不同的文學場域界定為主導文學場域和被主導文學場域，對於我們理解對這部書在美國的接受頗為有益。

布爾迪厄借鑒了經濟學中的資本概念，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等。經濟資本與市場、金錢相關；文化資本指的是人們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資本，如著作、譯作、文憑等；而社會資本則是個體在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係、社會地位、社會影響；象徵資本可以用來指代在一個文化中具有榮譽、聲望、獲得普遍認可的個體可以獲得的資源，比如被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就享有相當程度的象徵資本。在特定的場域之中，各種資本之間通過行為者相互博弈。

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實踐，“行為者”在翻譯這一社會實踐中做了什麼，怎麼做的，為什麼那麼做，都跟具體的場域和各種資本密切相關。瞭解場域、資本、行為人，對於我們理解英譯《廢都》這一翻譯活動、解釋相關現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廢都》出版後國內政治、經濟場域的博弈

《廢都》中文版1993年首次與讀者見面，一出版即引發極大爭

議，半年後就因為“格調低下，夾雜色情描寫”而遭到官方禁止，一夜之間賈平凹淪為流氓作家、反動作家、頹廢作家，直到2009年這一小說才得以解禁。從發表，到被禁，再到解禁，圍繞這部作品所發生的種種都是新時期中國文學史上眾人矚目的重要事件。該小說1993年首先在《十月》雜誌第4期開始連載，並由北京出版社推出單行本。這是一部描寫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生活的世情小說，以改革開放之後轉折時期的西安為背景，以莊之蝶與幾位女性的情感糾葛為主線，以西安另外三名文化名流的經歷為輔線，對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狀況和知識份子的精神風貌進行了較為生動、細緻的描繪。在小說付梓之前，坊間關於這部作品的傳言已經不脛而走，作品尚未完成就已經被炒得沸沸揚揚，多家出版社都趨之若鶩，希望爭得這部作品的出版權。經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之後，立即在全國書市引發洛陽紙貴的現象，同時也引起軒然大波。到1994年1月，因為“格調低下，夾雜色情描寫”而遭到官方禁止的時候為止，這部小說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除正式或半正式出版的一百萬冊外，出了大約一千多萬冊的盜印本，而且盜印多年來一直不停。^[1]印數之所以如此驚人，經濟資本如此可觀，跟《廢都》裡夾雜著大段細緻、露骨的性描寫有一定的關係。在赤裸裸的性描寫的後面，還附有“□□□□□□(此處作者刪去××字)”，表面上似乎在告訴讀者，作者預見到這些描寫在編輯那裡過不了關，因此主動對其進行了刪節，可是有學者認為，這是作者玩的一個噱頭，目的是引起讀者更大的好奇。小說遭到查禁很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其對社會陰暗面的揭露。書中的大量順口溜矛頭直指政府官員，暴露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面。例如：“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萬代享清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國內倒完國外倒。三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都報銷。四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等公民手術

刀，拉開肚皮要紅包。六等公民是演員，扭扭屁股就掙錢。七等公民搞宣傳，隔三差五解解饑。八等公民是工農，有的富來有的窮。九等公民是書生，海參魷魚分不清。十等公民愁百姓，學習雷鋒真來勁”（《廢都》2009: 3）。這樣的順口溜在當今反腐倡廉的語境下是再平常不過了，但在當時來看，顯得非常刺耳。除了官員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小說還對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進行了生動、細緻的描述，讓讀者看到了知識份子的彷徨、困惑和墮落，關於這一點，從小說的題目《廢都》就可以窺見一斑，強調的是一個“廢”字。作品被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畢竟，小說展示的是有問題的中國形象。況且，在當代中國，經濟場域長期以來弱于政治場域、屈從于政治場域，體制決定文化產品，文學產品的產生與流通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響。我們因此理解為什麼1994年在全國範圍內引起洛陽紙貴的《廢都》會突然被禁。經濟場域再可觀，跟政治場域相抵觸，最終必然遭遇被禁的命運。

三、早期海外華裔讀者對《廢都》的評價

1993年小說出版之後，1995年就有留學海外的華裔學者在美國西北大學的一個文學學術期刊TriQuarterly上面撰文，發表自己對這部小說的看法。作者首先談及這部小說傳遞的中國國民形象：“今日在中國男女心中燃燒的是一種更為原始、更加持久的火焰——性。除了性交之外，生活之中還有什麼？對廢都的市民來說，除了性交，就是吃喝、賄賂、算計和相互欺騙”（Zha 1995: 238）。小說人物眾多，但“沒有一個是無辜的或是招人喜歡的，包括主人公在內”（同上: 241），這其中既有“撒謊成性、腐敗墮落的市長，也有曲意逢迎的下屬、微不

足道的混混流氓和卑鄙無恥的小人，還有寡廉鮮恥的官員、騙人的演出者、造假的企業家、城府頗深的僕人、頤指氣使的風流尼姑、傳播性病的妓女，以及吸毒成癮的癮君子”（同上）。接著，作者討論了這部作品傳遞的國家形象：“小說以極為現實主義的筆觸，興致勃勃地徐徐道來，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古都生活的圖景：這裡的生活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講都是腐敗而扭曲的：無所不在的貪婪、腐敗與虛偽、迷信的思想、性壓抑和僵化的當權者”（同上）。同樣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引用其他學者的觀點對作家和作品進行了剖析：“對女人既渴望又恐懼的心理在賈平凹的小說中無所不在，只不過在《廢都》中顯得更加露骨而已”（Dai轉自Zha, 1995: 255）；繼而，該文又對小說中以作者代表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乃至現代男人的普遍心理進行了挖掘：《廢都》“是一場白日夢幻，是對一個感受到社會壓力和性壓抑的男人所進行的心理補償。在過去，賈平凹通過醜化具有誘惑力的女人來洗刷男性人物的罪孽。這一次，他在面對自己的矛盾心理，但方式上更加膽怯、無力。這是一種雙重幻想：主人公首先利用他作為‘文化名人’的地位吸引女人，然後用純粹的性能力來征服她們。他嘗試通過想像中的這個成功，來支撐他作為文人的自信。但是他的這個自信在現實中已經搖搖欲墜。這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謊言，不僅欺騙別人，也欺騙他自己，不僅顯示出賈平凹本人內心的焦慮，也顯示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以及現代男人當中廣泛存在的一種心理危機”（Dai轉自Zha, 1995: 256）。由於直到2016年才有英語譯本出版，小說發表之後，海外對於這部作品的評價者限於華裔學者，而且可以找到的關於《廢都》的書評不多，因此這篇文章引起一定程度的關注，反映了當時海外華裔學者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小說的發表有損於中國的國民形象、國家形象和作家、作品形象。

四、海外文學界對《廢都》的接受

雖然小說在國內被打入冷宮，但之後仍然被翻譯成日文、韓文、越南文、法文在國外出版，而且還在法國獲得文學大獎。海外學者對於這部作品的反應相對於國內及海外華裔學者而言迥然不同。小說被京都大學的教授翻譯成日文發表之後，在日本引起了廣泛關注。根據京都大學的留學生韓向東的說法，日本學術界對《廢都》的研究，從現當代中國文學專家到先秦漢唐的漢學家，學者們全面介入，特別是日本的老學者。……《廢都》在日本一版即印六萬部，這在魯迅著作多年的累計印數之外是外國文學在日本發行的新紀錄（孫見喜1998）。《廢都》在法國的接受與其在日本的接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在《廢都》被打入冷宮期間，法國學者安博蘭（Genevieve Imbot-Bichet）女士代表法國斯托克（Stock）出版社與賈平凹簽訂了翻譯合同，1997年推出了這部小說的法文版，並榮獲法國最重要的國際性文學獎項之一——費米娜外國文學大獎。這個文學獎項另外被有的譯者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譯為“女評委外國文學獎”。該獎項本來是由《幸福生活》雜誌的22名作家發起的，後來這本雜誌更是更名為《女性》，評委是清一色的女性，她們似乎並不覺得小說暴露了男性沙文主義傾向，反倒對這部作品情有獨鍾，把那一年唯一的費米娜外國文學獎頒給了《廢都》。根據譯者的描述，“此書一上市，立即得到法國文學界、讀書界極為強烈的反響，評價甚高，有人稱是讀中國的《紅樓夢》一樣有味道，有人驚訝當代中國還有這樣的作家，稱之為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偉大的作家”（賈平凹）。^[2]

簡而言之，日本學者在《廢都》這部文學作品中看到了真實的人物心理和中國人的生存境況，而日本商人則希望通過閱讀這部小說掌握進入中國市場的金鑰。對法國人來講，《廢都》是對人性的真實反

映、對人物的刻畫是吸引他們的一個重要因素。那麼美國人呢？美國一直處於世界文學場域的中心，英語文學場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世界文學場域，對於處於邊緣場域的其他文學基本都不太關注，除非其積極主動向英語文學場域移動。《廢都》英文版出版之後，the Complete Review網站的創始人Michael Orthofer三月份在他自己的網站上發表了關於《廢都》英文版的書評：“總的說來，《廢都》是一部強有力的小說，是一部振聾發聵的作品。小說取得了驚人的成功”。^[3]我們在2016年11月25日通過www.worldcat.org網站，檢索了《廢都》英文版在國外圖書館的收藏情況。結果發現，這部小說在美國的103家圖書館、加拿大的14家圖書館和德國的3家圖書館都有收藏，另外荷蘭、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新加坡也都有圖書館收藏。

五、英譯本的推介努力

相對於日語、法語等版本而言，《廢都》英文版可以說是姍姍來遲，直到2016年1月22日才有英文版出版。《廢都》的英文版Ruined City: A Novel能夠付梓出版，是多方力量(agent)共同努力的結果。布爾迪厄提出的agent這個概念，具體到翻譯活動，指譯者和譯文讀者之間的中間人。譯者也是行為者之一，“但行為者同時又可能是文學的贊助人、資助者、沙龍召集人或是在文化和語言政策方面引起變革的政治家或公司。行為者也許以雜誌、期刊、機構的形式存在，也許同時扮演其中兩種或者更多角色。行為者經常是獨立的個體，把大量的精力、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生命都投入到外國文學、外國作家、外國文學流派的譯介事業中，通過翻譯和書寫來教授、傳播外國的知識和文化”(Milton & Bandia 2009: 1)。具體到《廢都》，促成其英譯本成功

出版的行為者有多個：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國文學》)期刊、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以及出版社“今日中國文學書系”(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Book Series)顧問委員會的多名海內外學者、漢學家，其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是小說的譯者——美國漢學家、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葛浩文。

5.1 譯者的選擇以及譯者對《廢都》的推介

2016年1月，《廢都》英文版終於和英語讀者見面，最終獲得賈平凹授權並由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是葛浩文譯本。其實中國西北大學胡宗鋒教授與該校的一位英籍教師羅賓(Robin Gilbank)在2013年已經完成了《廢都》英文版的初稿。相比起來，葛浩文曾經師從美國著名漢學家許芥昱、柳無忌，具有印第安那大學的中國文學博士學位，而且已經翻譯出版了幾十部現當代中國小說，其中包括賈平凹的另一部小說《浮躁》，在美國漢學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文化資本、社會資本還是象徵資本方面以及最終可能帶來的經濟資本都不是別人可以比擬的，被稱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領域的首席翻譯家，因此賈平凹最終授權葛浩文翻譯此書也在情理之中了。

《廢都》譯者葛浩文是當代最多產的中國文學譯者，每年至少有一部譯作出版，有時甚至一年推出兩到三部譯作。或許是由於工作的繁重和時間的壓力，葛浩文譯作出版時大多沒有譯者序，有時譯者序只是隻言片語。但是在《廢都》英文版的前面，葛浩文提供了一篇篇幅較長的譯者序言。葛浩文在序言中闡述了幾個要點：首先，他指出《廢都》作為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所具有的價值，從而展示翻譯此書的意義。在他看來，有些作品擅長捕捉時代的精神和情緒，向當代讀者乃至後代讀者描寫小說涉及的特定時代，向人們展示那個時代的生活百

態，超越美學特點而為社會樹立起一面自我審視的鏡子，而《廢都》正是這樣一部作品，生動反映出“文革”結束之後不久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中國境況（Goldblatt轉自Jia 2016: 39/11213）。第二，譯者強調《廢都》在中國曾經是一部禁書，禁書總是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好奇和興趣，國內如此，國外尤其如此。強調小說是禁書，是西方譯者常用的推銷手段，也是葛浩文作為譯者的一個慣習。譯者指出，《廢都》被打入冷宮17年之後才獲得解禁，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有爭議的作品。譯者對《廢都》被禁的原因進行了分析：1.令人炫目的性描寫；2.暗淡的色調；3.不正常的人物關係；4.官員的負面形象和社會的陰暗面。譯者還指出，小說被禁的主要原因是性描寫，但其他的因素跟小說遭禁也脫不了干係（Goldblatt轉自Jia 2016: 43/11213）。第三，譯者翻譯時依據的底本是1993年的版本，積極呈現小說的本來面目。《廢都》原文在大陸主要有新舊兩個版本——1993年版和2009年版。“較之舊版，新版《廢都》內容上沒有任何改動，連字數和頁數也差不多。如果非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舊版中的‘□□□□□□(此處作者刪去××字)’，在新版裡變成了‘……(此處作者有刪節)’，顯得低調了很多。”^[4]有些地方這兩個標誌性的內容直接刪節掉了。英文版中雖然沒有說明譯者所依據的是哪一個漢語版本，但是可以判斷，譯者依據的不是低調的2009年版，而是1993年版，因為譯文中高調呈現表示刪節的具體字數以及代表刪節的方格。第四，葛浩文介紹了《廢都》被禁後地下偷運、盜版的情況，雖然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不能公開發售，但小說仍然有很多地下讀者，從而告訴英語讀者，《廢都》是一部深受讀者喜愛的作品（Goldblatt轉自Jia 2016: 47/11213）。第四，譯者提到小說1997年在法國翻譯出版獲得費米娜文學獎以及後來賈平凹被授予文學騎士勳章一事，從側面展示小說的國際水準及其對普遍人性的揭示（同上）。第五，譯者對賈平凹

本人進行了介紹，將其定位為“中國最受歡迎、最具有爭議”的作家，認為賈平凹興趣廣泛、才華出眾，執著于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不避諱對陰暗面進行描述（Goldblatt 轉自 Jia 2016: 59/11213）。葛浩文不愧是一名出色的推銷員，知道如何吸引西方讀者的興趣。除此之外，英語譯文盡量服務英語讀者，讓讀者喜聞樂見。原文不分章節，譯文也不分章節。原文段落很長，但譯文中的段落更多、更短，因為譯者在翻譯的時候，把一些段落切分成更小的段落，尤其是對話的部分，這樣可以使譯文更加符合英語語篇的習慣。譯文所使用的語言是當代讀者的語言風格。葛浩文在譯者序言裡這樣寫道：“在進行翻譯的準備過程中，我一直克制自己的衝動，不讓自己為譯文增添現代色彩，同時又避免使用過於古雅的語言。二十一世紀的流行術語或是古雅過時的詞語及表達方式放在一部二十世紀的小說裡會顯得很空洞，並進一步破壞這樣一種幻覺：讀者沒有通過譯者的干預在直接面對原作者”（Goldblatt轉自 Jia 2016: 120/11213）。譯者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領域的領軍人物，被譽為首席翻譯家，他不僅翻譯技藝嫻熟，而且在推廣譯作方面付出了積極的努力。

5.2 出版社對《廢都》的推介

出版社在小說的封底對《廢都》的評價與譯者的評價如出一轍，強調小說是一部禁書，是一部對現實進行諷刺和批判的經典作品，同時加入了對小說翻譯品質的評價：“《廢都》1993年面世之後，立刻被中國國家出版總局宣佈為禁書，被禁的名義是小說裡面有赤裸裸的性描寫。從此之後，獲獎作家賈平凹對於社會和經濟轉型時期當代中國的生動描述就成為經典，這部小說被中國文學界的評論家和學者們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葛浩文嫻熟的翻譯使英語讀者第一次

有機會閱讀到這部由中國最有批判意識的作家完成的社會諷刺佳作。一方面，小說中充斥著‘色情’的成分，色情內容、異國情調和神秘難解的細枝末節使小說遭到官方的批判；另一方面，小說通過對主人公——一位著名當代作家所經歷的性糾葛和法律糾紛的描寫，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急劇變革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萬象。小說以權力政治、腐敗和資本主義制度盛行的現代大都市為背景，喚起人們對前現代化時期、昔日鄉村生活的一廂情願的渴望，儘管小說中不斷演變的事件警示人們不要陷入懷舊的陷阱。作者非常關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審查制度，以及知識份子文化產出的嚴肅性和藝術創作的誠實性，並把這種關注不動聲色地融入到小說中的鬧劇和喧囂中。小說描寫細緻、形象生動，把讀者帶入古怪陸離、冷酷無情的現代生活。”不難看出，出版社推介《廢都》的思路與譯者的思路如出一轍，為了推介此書也是不遺餘力。

5.3 其他參與推介的行為者

《廢都》是美國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期刊推出的“今日中國文學書系”中的一部，叢書主編是期刊的副主編 Jonathan Stalling。在這個系列已經推出八部作品。^[5] 六部作品中有兩部詩集、兩部短篇小說集和兩部長篇小說單行本，而賈平凹的《廢都》就是這兩部小說中的一部，另一部是諾獎得主莫言的作品《檀香刑》。小說出版之後，該期刊在2016年的第二期上對這部譯作進行了宣傳和推介。該系列叢書的顧問委員會陣容強大，除了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的副主編，還有美國最有影響的文學期刊 World Literature Today (《當代世界文學》) 的主編 Daniel Simon 及其執行主編 Robert Con Davis-Undiano、國內最有影響的文學期刊《人民文學》的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

另外還彙集了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富有影響的多位中美知名學者，其中有美國聖母大學退休教授、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芝加哥大學蘇源熙（Haun Saussy）、加州大學的葉維廉（Wai-lim Yip）、奚密（Michelle Yeh）、黃運特（Huang Yunte）、斯坦福大學的李海燕（Haiyan Lee）、康涅狄格學院的黃亦兵（Yibing Huang）、阿爾伯塔大學的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以及來自奧克拉荷馬大學的葛小偉（Peter Hays Gries）、Ronald Schleifer和Paul B. Bell三位教授；國內學者則包括北京大學的陳曉明、四川大學的曹順慶、人民大學的程光燁、清華大學的格非、瀋陽師範大學的孟繁華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劉洪濤、張健、張甯、張清華等教授。李敬澤和陳曉明都是《廢都》的支持者，2009年《廢都》再版時二人曾經為其作序。從這個強大的顧問委員會的陣容可以看出，這部小說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界都受到推崇和認可，這些著名學者的支持為小說英文版的出版準備了條件。上述機構和學者為什麼如此積極推介這部作品？小說被翻譯成英文出版，首先是小說本身的藝術水準高。其實小說被翻譯成日語的時候，就有人懷疑小說被積極翻譯成日文，並受到日本讀者的歡迎，是因為小說中的性描寫。性描寫內容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有學者指出，“《廢都》在日本的盛況不能理解為性描寫的功勞；……從前看中國小說都是在說教，暴露人的心理很拘謹，總要回避骯髒，這本書的最大突破是藝術性地表現了特定時空裡一群人的心理真實。以前中國小說都是迴避社會問題的，而《廢都》不議論什麼道理，只寫生存狀態，日本讀者這回真正把小說當內心世界來看，賈是真正的作家，有真正的藝術追求”（孫見喜2001: 324-325）。《廢都》中的性描寫算不上高明，吸引海外譯者的也不都是性描寫，而是性描寫所折射出來的人物心理。賈平凹在題頭中指出，“唯有心

靈真實”，昭示《廢都》是一部反映文人心靈的作品。小說生動再現了當代文人的生存和生命狀態、心靈發展軌跡，表現了失去精神支柱的當代文化人矛盾與困惑、躑躅與彷徨、頹廢和沉淪，而莊之蝶這個人物，正是這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再者，小說既有對當代城市生活的不加雕飾的嚴苛反映以及對人性的挖掘，還有對社會的審視與反思。葛浩文在譯者序中引用1993年《廢都》中文版編輯田珍穎的話說，小說“描寫了一代知識份子的墮落以及社會衰敗背後的原因”（Goldblatt轉自Jia 2016: 99/11213）。此外，小說在出版23年之後被翻譯成英文版，還跟作家的地位以及這部小說本身在中國新時期文學史上的影響力密切相關。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先後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8）、“中國作協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4）、“全國優秀散文獎”（1989）、“第三屆魯迅文學獎”（2005）、“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2006）、“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08）、“施耐庵文學獎”（2011）和“第二屆朱自清散文獎”（2012）；他的小說《浮躁》曾經由葛浩文翻譯成英文，並且在1987年獲得“美孚飛馬文學獎”。就《廢都》而言，雖然沒有在國內獲獎，但影響超過賈平凹的其他所有作品，而且法文版已經在法國獲得“費米娜外國文學獎”。作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主要譯介者，對於這樣一部影響巨大的作品，哪有不翻譯的道理。只是1993年小說剛剛問世的時候，中國當代文學還沒有引起美國讀者的足夠重視，翻譯的時機還不成熟，二十多年後，隨著中國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日益重要的角色，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不斷推進，《廢都》這樣一部曾經引起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議的作品的英譯自然成為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奧克拉荷馬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聯合打造的中國文學期刊的不二選擇。那麼這部譯作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如何呢？

六、英文版的接受情況及原因分析

作者是中國知名作家，作品是20世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譯者是現當代中國文學的首席翻譯家。不僅如此，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國文學》）期刊、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以及出版社“今日中國文學書系”顧問委員會的多名海內外學者、漢學家，都為推介這部作品付出了積極的努力。但是，客觀地講，這個英譯本的接受似乎有些差強人意。英譯本2016年1月推出，兩年時間過去了，雖然不少大學出版社都收藏了這本書，但是普通讀者對這部作品的接受似乎并不是很理想。亞馬遜網站上讀者對這本書的回饋並不積極，可以說門前冷落，一共就只有三位讀者上傳了讀後感想，而且反響也很一般，在五星的評級系統中只獲得2.5星。對於英文譯本的學者評論也屈指可數。2016年3月20日《紐約時報》上刊登了Jess Row撰寫的簡短書評，書評首先對小說的主要內容進行了描述，然後指出小說和傳統中國名著一樣，著力於細節的描寫，缺少情節驅動，最後評論者認為，小說既沒有刻意描寫人物的創傷，也沒有對政治表示出濃厚的興趣。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上面刊登了關於這本書的介紹，此外就是前面提到過的the Complete Review網站，除了對小說總體上表示讚賞之外，網站對小說還有如下評論，或許道出了小說缺少讀者的原因：《廢都》的敘事節奏跟當代的大多數小說都不盡相同。小說推進緩慢，所涉及的人物行動非常有限，甚至無關緊要。小說有不同的敘述線索，人物隱而不見，花去很多筆墨的不是人們想像中的核心故事，而是一些偶然事件的細枝末節，即使在小說發展到高潮——對簿公堂的時候，作者也置身於一定距離之外，更傾向於進行間接的概括。讀者的確需要一定的耐心去讀這種路人旁觀式的敘事手法，很多讀者讀起來或許覺得有些得不償失。

總的來說，這是新時期中國文學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不僅藝術水準較高，而且是一部生動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反映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社會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帶給知識份子的苦悶、彷徨以及他們的墮落，是一部具有反思精神的作品。23年之後，國內外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開始嘗試將這部作品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英語讀者，相關機構和人士都付出了積極努力。小說在英語世界的接受並不盡如人意，具體原因在筆者看來，恐怕有多個。首先，根據卡薩諾瓦的觀點，在全球文學交流中，在世界文學場域裡，不同的子文學場域地位不同，有的子文學場域處於主導地位，比如英美文學場域，而中國文學場域是被主導的文學場域，中文和印度文、阿拉伯文一樣，雖然有著悠久的文學歷史，而且語言的使用者人數眾多，但是其子文學場域處於被主導的地位，因為其文學作品在國際文學市場上鮮為人知、沒有獲得認可（Casanova 2010: 290）。《廢都》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是從被主導的子文學場域向主導文學場域移動，因為其所附著的中文和中國文學所具有的文學資本不夠豐厚，其接受起來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第二，小說反映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真實圖景，引起了日本和法國的興趣，日本商人特別喜歡這部作品，因為他們希望通過這部作品瞭解進入中國市場的金鑰；法國人喜歡這部作品，是看中了作品對人性的挖掘；23年後，美國人來看這部作品，內容已經時過境遷了，當時帶給讀者新奇的內容——包括裡面的性描寫，現在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英語世界都已經不再能夠引起波瀾。第三，小說的譯文洋洋灑灑，長度有五百多頁，估計也讓讀者望而生畏；第四，小說著力於對生活細節的描寫，缺少懸念和情節驅動，導致讀者閱讀此書的積極性不高；最後，這部小說由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普通讀者當中的推廣和接受非常有限。如果改變一下出版推廣模式，情況或許能夠大為改觀。目前賈平凹剛剛出版了另一部作品《高興》的英譯本，雖然《高興》在國內的影響比不上《廢都》，譯者也沒有葛浩文那麼多產、有影響，譯作中甚至還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問題，但是其英文版的接受卻比較好，獲得了讀者的積極接受，背後的原因，除了小說的情節性略強之外，通過與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Amazon Crossing）合作推出小說英文版，省掉了出版社的環節，亞馬遜可以獲得更高的經濟資本，譯者稿酬更高，市場價格更低，以此吸引更多讀者，證明是較為有效的圖書翻譯、推廣模式。總之，《廢都》這部小說被禁、被譯介到日本、法國，最終進入英語文學場域，每一步都與特定的社會文化因素——場域、資本和行為人息息相關。

注釋

- [1] 賈平凹，〈給尚×的信——關於獲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的前後〉，賈平凹吧，檢索於2006年9月2日。<https://tieba.baidu.com/p/130271945>。
- [2] 同上註。
- [3] <http://www.complete-review.com/main/main.html>。
- [4] 鄭亮，〈《廢都》未刪節版解禁出版賈平凹‘如釋重負’〉，中國經濟網，2009年7月29日。轉引自鳳凰網：[HTTP://book.ifeng.com/psl/sh/200907/0729_3556_1274644.shtml](http://book.ifeng.com/psl/sh/200907/0729_3556_1274644.shtml)。
- [5]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今日中國文學書系”一共有八部。其中2012年：Winter Sun: Poems 和Sandalwood Death: A Novel；2014年：Rhapsody in Black: Poems；2015年：Chutzpah! New Voices from China；2016年：Ruined City: A Novel和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2018年：Record of Regret: A Novel；2019年：Colortura。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資助項目“當代小說英譯中的文學性再現與中國文學形象重塑”的階段性成果（課題號：17BYY202）。

參考文獻

- Basu, Chitralkha (2010). "Quest for Nation's Unsung Literary Gems." *China Daily*, 23 April 2010.
-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sanova, Pascale (2010). "Consec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terary Capital: Translation as Unequal Exchange". In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Mona Baker. London: Routledge, 286-303.
- Chen, Thomas (2015). "Blanks to be Filled: Public-Making and the Censorship of Jia Pingwa's *Decadent Capital*". *China Perspective* 1:15-22.
- Jia, Pingwa (2016). (Howard Goldblatt, trans.) *Ruined City: A Novel* (kindl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Milton, John & Paul Bandia (2009). *Agent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Orthofer, Michael (2016). "Ruined City Review". accessed 26 March 2019. <https://u.osu.edu/mlc/2016/03/21/ruined-city-review/>.
- Row, Jess (2016). "Jess Row reviews *Ruined City*". *New York Times*, 20 June 2016.
- Zha, Jianying (1995). "Yellow Peril". *TriQuarterly* 93: 236-263.
- 賈平凹 (2009), 《廢都》, 北京: 作家出版社。
- (2006), 〈給尚×的信——關於獲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的前後〉, 賈平凹吧, 檢索於2006年9月2日。 <https://tieba.baidu.com/p/130271945>。
- 鄺亮 (2009), 〈《廢都》未刪節版解禁出版賈平凹“如釋重負”〉, 中國經濟網, 2009年7月29日。
- 孫見喜 (1998), 〈賈平凹的1997〉, 《時代文學》, 1998年第4期。
- (2001), 《賈平凹前傳》(第三卷), 廣州: 花城出版社。

作者簡介

孫會軍, 女,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研究興趣: 現當代中國文學譯介研究; 文學翻譯。

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
傳播與接受
——基於英譯本館藏分佈、
評論及獲獎情況的考察

趙雲龍

Abstract

Yang Lian's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Book Reviews/Awards (by Zhao Yunlong)

More than 80 years have passed and approximately 220 anthologies of new Chinese poetry (NCP) have come out since NCP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he middle 1930s. Despite the considerably long history and large scale of translating NCP into English, studies on it have been lagging behind,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and too little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poet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of 12 anthologies of poetry by Yang Lia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analyzing how they have been collected by librari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area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reviewed and awarded by Anglophone readers. It is found that Yang's 1999 anthology Where the Sea Stands Still: New Poems turns out to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that high-quality literary works tend to have more lasting influences than do their socio-political backgrounds or the literary

history comprised of them; that the most frequently translated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or the most readily received; a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of a translation tend to have little to do with its translating mode.

一、引言

中國新詩自誕生以來，詩潮沉浮、詩派林立、詩人輩出，至今已歷百年。20世紀30年代中期，英人哈羅德·阿克頓（Harold Acton）與陳世驥合作編選、翻譯並於倫敦出版了《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6），是為中國新詩80餘年英譯史中的濫觴之作。據筆者統計，截至2017年，英語世界^[1]自發推出的英譯中國新詩選集已有220餘部。然而遺憾的是，圍繞中國新詩在英語世界譯介活動展開的專論僅有110篇左右。這些研究對英譯中國新詩文本生成環節用力有餘，對傳播與接受環節關注不足；涉及傳播與接受環節的少量研究中因襲舊論者多，獨力考察者少。鑒於此，學界有必要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以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著力探討英譯中國新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通過參照自行編纂的英譯中國新詩選集書目，筆者發現，朦朧詩派是英語世界譯介最為頻繁、成果最為豐碩的中國新詩流派，其中又以楊煉為最。因此，楊煉可以構成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那麼，英譯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情況如何？接受情況又如何？楊氏的哪些詩集或詩作在英語世界最受歡迎？為解答以上問題，筆者參閱了翻譯學界有關外譯中國文學作品在目的語國家傳播與接受情況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統計銷售量”、“考察館藏分佈情況”、“對讀者做問卷調查”、“分析譯評”、

“調查獲獎情況”以及“鉤沉譯本對目的語國家或地區作家的影響”幾種。概而言之，“分析譯評”和“考察館藏分佈情況”易於操作，目前使用得最多，已經相對成熟；“統計銷售量”時出版商的內部數據涉及商業機密，不易獲取；“對讀者做問卷調查”從受試對象的選擇、問卷的設計到調查的實際進行都對研究條件和研究者本身有著嚴苛的要求，不易操作；“調查獲獎情況”由於只適用於極少數作品，因此操作相對簡單；而“鉤沉譯本對目的語國家或地區作家的影響”一般針對出版年代與當下間隔較長、切實對目的語國家或地區作家產生過影響的譯本而言，對於問世僅有30餘年、影響力暫時較為有限的英譯楊煉詩歌並不適用。綜合以上，本文擬通過“考察館藏分佈情況”、“分析譯評”以及“調查獲獎情況”考察英譯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

英譯中國新詩選集分為3種，包括：(1)包含英譯中國新詩的中國詩歌或文學綜合選集；(2)英譯中國新詩人多人選集；以及(3)英譯中國新詩人個人選集。收錄英譯楊煉詩歌的共有26部，包括綜合選集6部、多人詩選8部、個人詩選12部。考慮到多人詩選和綜合選集中都收錄了幾人甚至幾十人的詩作，其接受效果不單單取決於楊煉一人，甚至不單單取決於詩歌一種文學體裁，本研究只集中考察楊氏的12部英譯個人詩選。希望藉此研究，可以厘清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同時以此為出發點就中國新詩英譯乃至中國文學外譯提出幾點思考。

二、楊煉詩歌英譯本的館藏分佈

楊煉(1955—)，祖籍山東，生於瑞士伯爾尼，長於中國北京，朦朧詩派代表人物之一。1974年高中畢業後下鄉插隊，並在此期間開始詩歌創作。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成為北島、芒

克等人創辦的《今天》雜誌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在《上海文學》第5期發表組詩《諾日朗》，引發詩壇論爭。1988年與芒克、唐曉渡成立“倖存者詩人俱樂部”並創辦《倖存者》詩刊，同年去國旅居澳洲。1994年起，定居倫敦、柏林至今。2016年重啟“倖存者詩人俱樂部”，次年正式復刊《倖存者》詩刊。楊煉40餘年來筆耕不輟，著有詩集、散文集、文論集以及對話集多種。其詩風以《諾日朗》為界，上承“掙脫牢籠喋血歌唱”的朦朧詩派核心人物北島，下啟“走向文化深層，追求史詩品格”的“新傳統主義”、“整體主義”等“第三代”詩歌團體（李新宇1993: 309, 326-327; 李振聲1996: 6-8, 199）。截止到目前為止，楊煉的詩作已被譯成英語、德語、荷蘭語、丹麥語、義大利語、法語、日語、蘇格蘭語、斯洛文尼亞語以及阿拉伯語等30多種語言，其國際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如前所述，楊煉在英語世界出版的英譯個人詩選有12部之多，居所有中國新詩人之最。這些詩選的出版地先後遍及澳大利亞、英國、美國、香港、新西蘭等英語世界國家和地區。借助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提供的世界各國圖書館藏書目錄(WorldCat)，考察楊煉詩歌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的館藏分佈情況，可以大致勾勒出楊煉詩歌在整個英語世界的傳播圖景。

依據檢索OCLC所得書目數據(最後檢索日期為2019年1月8日)，我們發現：其一，除英語世界之外，楊煉的12部英譯個人詩選大多在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分佈，但仍以英語世界為主，非英語世界所占比重極小；其二，無論在全球範圍內還是僅限英語世界，收藏這些譯本的圖書館數量都存在較大差異(見表一)。僅就英語世界收藏楊煉詩歌英譯本的圖書館數量而言，《大海停止之處：新詩集》《面具與鱷魚：一位中國當代詩人及其詩歌》和《同心圓》列居前三，是傳播情況相對較好的。

表一 楊煉詩歌英譯本收藏館數一覽(依英語世界收藏館數降序排列)

排名	英譯本中文標題	世界範圍內收藏 該譯本圖書館數量	英語世界收藏 該譯本圖書館數量
1	大海停止之處：新詩集	173	168
2	面具與鱷魚：一位中國當代詩人及其詩歌	146	140
3	同心圓	126	124
4	幻象城市：中國詩人在奧克蘭	104	101
5	YI	102	97
6	李河谷的詩	88	86
7	騎乘雙魚座——五詩集選	42	36
8	敘事詩	33	33
9	幸福鬼魂手記	31	29
10	無人稱：楊煉詩選	3	0
	與死亡對稱	0	0
	流亡的死者	0	0

除了英語世界收藏每部譯本的圖書館數量之外，OCLC還提供了這些圖書館在英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分佈情況。根據OCLC提供的原始數據，筆者對楊煉詩歌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具體分佈情況做了總結梳理（見表二）。由表二可以看出，對於任何一個譯本而言，美國都是其最為主要的分佈地。有些譯本在6個英語國家以及香港地區均有分佈，餘者的分佈國家或地區則分別有6個、5個以及4個不等。如果以地域分佈衡量，《大海停止之處》《同心圓》和《騎乘雙魚座——五詩集選》的傳播範圍最廣。

表二 楊煉詩歌英譯本在英語世界館藏分佈情況一覽
(依分佈國家/地區數量降序排列)

排名	英譯本中文標題	英語世界不同國家/地區收藏該譯本圖書館數量						
		澳	加	英	港	愛	新	美
1	大海停止之處：新詩集	2	5	45	2	6	1	107
	同心圓	1	4	22	5	1	1	90
	騎乘雙魚座——五詩集選	1	1	4	2	1	2	25
2	面具與鱷魚：一位中國當代詩人及其詩歌	18	8	5	2	0	2	105
	李河谷的詩	3	3	8	2	1	0	69
	幻象城市：中國詩人在奧克蘭	2	6	4	5	0	19	65
3	幸福鬼魂手記	3	0	4	4	0	2	16
4	YI	1	6	2	0	0	0	88
	敘事詩	0	2	0	1	0	1	29

當然，收藏譯本的圖書館數量及分佈只能大致從定量的角度反映楊煉詩歌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圖景，對於英語世界讀者的閱讀體驗以及回饋情況則無從考量。至於這些譯本在英語世界讀者中的反響如何，還須借助譯評加以考察。

三、楊煉詩歌英譯本的譯評

如前所述，考察譯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接受效果時，分析譯評是當前翻譯學界應用最為頻繁和廣泛的研究方法。根據撰寫者以及刊載媒介的不同，可以將譯評大致分為專業讀者譯評和普通讀者譯評兩類。關於翻譯評論的功用，有學者指出，“專業型讀者……的評論性

文章起源較早、數量較多，反映出中國文學域外接受的一個方面，亦能引導媒體及大眾讀者”（王穎沖、王克非 2015: 42）；而普通讀者“多為不專門研究文學與翻譯的普通群體，其意見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與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普通讀者對作品的接受程度”（王金波 2016: 302）。筆者依託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讀秀-百鏈資料庫等學術檢索平臺以及英語世界重要圖書網站、論壇，以楊煉詩歌英譯本的英文標題為關鍵字分別檢索，並將檢索結果彼此互參，共得到譯評28篇（條）。其中，由專業讀者撰寫、發表在學術性期刊和大眾普及型報刊上的有23篇；由普通讀者撰寫、發佈在圖書網站和論壇上的只有5條。下文將對這兩類譯評分別展開述評和分析。

3.1 專業讀者譯評

根據筆者的檢索結果顯示，楊煉詩歌英譯本的23篇專業讀者譯評散見於英語世界13種學術性期刊和大眾普及型報刊。學術期刊可以根據研究領域大致分為4類，分別為語言 / 文學 / 翻譯類、區域國別研究類、政治學類以及圖書館學類。語言 / 文學 / 翻譯類期刊有6種，其中《今日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 刊載譯評數量最多，共有6篇；《翻譯與文學》(*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刊有2篇；《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加拿大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新西蘭英語》(*English in Aotearoa*) 和《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各刊有1篇。區域國別研究類期刊有3種，其中2種為中國研究期刊《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和《澳大利亞中國事務》(*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分別刊載譯評3篇和1篇；另外1種為太平洋地區研究期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刊有2篇。政治學類期刊《新政

治家》(*The New Statesman*)和圖書館學類期刊《校圖書館員》(*School Librarian*)各刊有1篇。大眾普及型報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和《站立》雜誌(*Stand Magazine*)則分別刊載譯評2篇和1篇。由以上分佈情況可知,英譯楊煉個人詩選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學術界,而且頗受語言/文學/翻譯類和區域國別類期刊青睞。相比之下,同樣由專業人士撰寫、讀者群更為龐大的普及性報刊的評介力度則明顯要小得多。

楊煉的英譯個人詩選雖然有12部之多,但並非每部都得到了英語世界專業讀者的評介,例如《與死亡對稱》和《同心圓》兩部選集便至今都沒有相關的譯評在英語世界刊發。在餘下10部得到英語世界專業讀者評介的譯本中,《大海停止之處》所獲評論數最多,共有6篇;《面具與鱷魚》和《幻象城市》次之,分別有5篇和3篇;《流亡的死者》和《敘事詩》再次,各有2篇;《無人稱》、《YI》、《幸福鬼魂手記》、《騎乘雙魚座》和《李河谷的詩》則相對較少,各有1篇。^[2]因此,僅就英語世界專業讀者譯評數量而言,《大海停止之處:新詩集》、《面具與鱷魚》和《幻象城市:中國詩人在奧克蘭》的接受效果相對更為理想。

那麼,楊煉詩歌英譯本具體獲得了何種評價?評者是將這些譯本作為文學作品還是社會學資料加以解讀的?對於作為文學作品解讀的譯本而言,評者對其主題、風格/手法/技巧作何評價?對於譯本本身又作何評價?通過對所得譯評逐一細讀,筆者發現,除Davin(1991)和Lee(1991b)在評價《面具與鱷魚》和《流亡的死者》時幾乎通篇談論政治卻對文學著墨甚少之外,其餘評者的注意力都主要集中在楊氏作品的文學性上。下文將從主題、風格/手法/技巧和翻譯三個角度出發,擇選譯評中具有代表性者,對英語世界專業讀者的文學性解讀加以梳理。

論及主題的評論主要涉及到《面具與鱷魚》、《無人稱》、《幸福鬼魂

手記》、《幻象城市》和《敘事詩》5部選集，其中《面具與鱷魚》和《幻象城市》分別有3條和2條論述，其餘3部各有1條。利大英（Gregory Lee）指出，“《面具》所關注的顯然是欺隱與瞞騙”；而“《鱷魚》與《面具》相似，都以虛偽和奸詐為主題”（Lee 1991a: 385-386）。梁啟昌（Kaicheong Leung）的觀點與利大英不謀而合，認為“‘面具’和‘鱷魚’都是虛偽、醜惡和暴力的隱喻”（Leung 1993: 234）。另外，陶忘機（John Balcom）認為這部選集無論就主題還是風格而言都堪稱楊煉的轉型之作（Balcom 1994: 212）。關於《幻象城市》，柯西瑪·布魯諾（Cosima Bruno）指出其中收錄的詩作“圍繞個人歷史與記憶的瓦解以及這種瓦解在詩學體驗中的體現方式展開，關注的問題既包括流亡在外的危險與可能，也包括失去與分離”（Bruno 2006: 811）。王一燕則認為，楊煉身在奧克蘭期間，“‘死亡’成為其流亡詩學的中心主題”（Wang 2006: 514）。兩位學者的觀點既有共同之處，又能相互補充。《無人稱》和《幸福鬼魂手記》留給英語世界專業讀者的印象與《幻象城市》大致相同：西敏（Simon Patton）將前者比作“一部死亡學著作，一項關於死亡與腐朽的長期調查，一間文學的停屍房（nothing if not a thanatology, a prolonged investigation of death and decay, a literary mortuary）”（Patton 1995: 871）；西爾維亞·馬裏尼森（Silvia Marijnissen）則認為後者的主題是流亡和無家可歸（Marijnissen 2003: 462）。最為新近的《敘事詩》留給英語世界讀者的印象與以上幾部選集有所不同，如柯夏智（Lucas Klein）所言，“相比楊煉先前的作品，《敘事詩》更加個人化，具有更為直接的自傳特質”，不過“在楊煉的詩歌中，個人、政治以及歷史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界限”（Klein 2018: 275-276）。

論及風格／手法／技巧的評論所涉選集數量更多一些，共有《面具與鱷魚》、《無人稱》、《大海停止之處》、《幸福鬼魂手記》、《YI》和

《幻象城市》6部。其中《面具與鱷魚》有4條論述，《大海停止之處》有2條，其餘幾部各有1條。關於《面具與鱷魚》的寫作手法，利大英和梁啟昌都談到了意象的使用問題。前者認為，“楊煉將諸多意象並置，或許是為了震撼讀者，使其重新對真理和語言進行反思”（Lee 1991a: 385）；後者則認為，“《面具與鱷魚》以赤裸裸且荒誕無理的意象侵犯讀者的感官……動輒便對邏輯和理性橫加阻礙”（Leung 1993: 206）。另一位評者西敏雖然沒有明確提及意象，但認為整部詩集為讀者勾畫出了一個“隱晦而且高度扭曲變形的世界”（Patton 1993: 206），與楊氏非常規的意象使用方式也不無關係。《大海停止之處》的兩位評者在意象問題之外，還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超現實主義。亞當·紐維（Adam Newey）指出，“楊煉的感受力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意象彼此疊加，似衝非衝，似撞非撞，在相合之處產生了非同尋常的衝突和異想天開的意義結構”（Newey 2000: 58）。傑弗裏·特威切爾—瓦阿斯（Jeffrey Twitchell-Waas）的論述雖然措辭略有不同，但核心觀點卻與紐維如出一轍。他認為這部選集中的作品“仍然有著主知的成分，只不過語言更為純粹。各種意象充斥其中，除重複或彼此關聯、共鳴的情況之外，始終處於漂浮不定的狀態……多數西方讀者會聯想到超現實主義”（Twitchell-Waas 2000: 354）。有關其餘幾部選集創作風格／手法／技巧的評論如下：

《無人稱》：楊煉在**意象**的營造方面有著不容置疑的卓越才能（Patton 1995: 871）。

《YI》：語言很密集——常常會壓得人透不過氣——其中的**意象**不斷變化、扭曲、消退和重現（Twitchell-Waas 2003: 93）。

《幸福鬼魂手記》：大量**意象**反復出現，讀者閱讀這些作品時會感覺如同穿行在一團團迷霧中（Marijnissen 2003: 462）。

《幻象城市》：【楊煉】對語言、**意象**、主題以及技巧進行了大膽的實

驗……放棄了連貫敘事，更為青睞**意象**、印象、記憶和沉默的堆疊（Bruno 2006: 811）。

上述評論出自不同評者之手，所針對的選集也各不相同，但卻無一例外地提到了意象問題。由此可見，楊煉詩歌給英語世界專業讀者印象至深的莫過於詩人對於意象的非常規式經營。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討論楊煉詩歌的主題還是風格 / 手法 / 技巧，前文援引的評者們所直接面對的都是楊煉詩集的英語譯本，而不是漢語原本。實際上，這些評者中不乏華裔學者和通曉漢語的英語母語者，他們都具備雙語對讀並對譯本本身做出品評的能力。儘管如此，論及翻譯的評論並不多，只有如下幾條：

- 《面具與鱷魚》《流亡的死者》：陳順妍的譯詩很精彩（Davín 1991: 13）。
- 《面具與鱷魚》：《面具與鱷魚》的譯文……沒有達到原詩的高度……儘管陳順妍教授為其投入的熱情隨處可見，但譯文卻品質平平。我時不時地會去翻看一下中文，這樣纔能明白英文想要表達什麼。（Balcom 1994: 212）
- 《流亡的死者》：陳順妍的譯詩頗見功力，忠實地傳達了原詩的味道（Lee 1991b: 13）。
- 《無人稱》：儘管原詩充滿死亡氣息，但譯者霍布恩（Brian Holton）語感極強，能透過表象找到最佳英文對應詞。這部選集堪稱翻譯藝術的典範。（Patton 1995: 871）
- 《大海停止之處》：由於霍布恩與楊煉的合作方式較為特殊，譯詩同中文原詩無異，同樣具有原創性（Newey 2000: 58）。
- 《敘事詩》：《敘事詩》堪稱一項由詩人與譯者共同取得的驚人成就，二者幾乎合而為一……楊煉運用英語世界所指框架之外的典故的地方，霍布恩都提供了注釋……楊煉遺用的語詞中富含思想和情感，霍布恩的譯詩同樣如此……偶爾會有些誤譯……人們似乎永遠都在嘀咕著翻譯中“丟掉”的東西，但此處霍布恩的譯詩卻明顯增強了原詩的效果（Klein 2018: 275；277-278）。

曾有翻譯學者指出，譯評的作者往往在行文中對譯本本身絕口不提（如 Christ 1982: 16；Schulte 1995: 1；Schulte 2000: 3；Schulte 2004: 1）。在楊煉的案例中，論及譯本本身的評論雖然不及討論主題和風格／手法／技巧的評論數量多，但總體而言還沒有達到“絕口不提”的地步。不過就分析的深度而論，卻未免流於膚淺。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Davin（1991）和Lee（1991b）對於陳順妍譯詩與Klein（2018）對於霍布恩譯詩的評價都停留在傳統的印象式點評，其中諸如“忠實地傳達了原詩的味道”、“增強了原詩的效果”甚至“很精彩”、“頗見功力”、“驚人成就”之類的表述實際價值近乎於無，而且大多出現在長篇臃腫的政治評論之後，顯得有些不痛不癢。相比之下，Patton（1995）和Newey（2000）對霍布恩譯詩的評價在深度上更勝一籌。例如，Newey（2000）沒有局限於單純的翻譯品質評估，而是考慮到了翻譯模式（即合譯者的總體分工和具體翻譯流程）這一文本外因素。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或許是受篇幅所限，柯夏智之外的幾位評者均未在行文中提供譯例。

3.2 普通讀者譯評

與專業讀者譯評相比，普通讀者譯評的獲取途徑更為駁雜，檢索方式也更為繁瑣。筆者先後檢索了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四國的亞馬遜網站、美國閱讀社區“好讀（Goodreads）”和羅賈斯特大學“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項目網站、英國“文化飛翔（Culturefly）”和“書包（Book Bag）”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國的“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文學愛好者（Anzlitlovers）”等英語世界書評網站，僅得到5條英譯楊煉詩歌選集的評論，其中美國亞馬遜1條，“好讀”4條。有趣的是，網友Robert Beveridge先後於2008年6月25日和同年8月19日在“好讀”社區和美國亞馬遜網站上就《幸福鬼魂手

記》發佈的兩條評論內容完全相同，認為這部選集“在各個方面都糟糕透頂 (Absolutely terrible in every respect)”，但對於主題、風格 / 手法 / 技巧以及譯本本身均未做任何評價。此外，網友H於2014年5月24日發佈在“好讀”社區網站上的評論只有一小段摘自《幻象城市》中的譯詩，嚴格說來還不能算作譯評。這樣一來，真正符合條件的普通讀者譯評實際上只有3條。與Robert Beveridge對《幸福鬼魂手記》的評述之簡單粗略不同，其餘兩條評論的對象都是《大海停止之處》，而且論述詳盡得多。因此，無論就英語世界普通讀者譯評的數量還是分析的深度而言，《大海停止之處》都是接受效果最為理想的。下面對這部選集的兩條譯評簡要地加以分析。

2013年2月10日，網友James發表評論如下：

毫無疑問，楊煉走在中國現代詩歌的前沿，這部選集中收錄的作品便是明證。他是一位大膽的現代主義詩人，在《大海停止之處》中以追求成熟智慧為主題，並將現代性熔鑄於中國傳統之中，探討生存與死亡的平淡無奇，經營出一種十分令人不安的怪誕意象。譯詩也非常出色，楊氏的語言和意象通常很難，但霍布恩不但準確地譯出，而且保留了原詩的聲律。^[3]

這位網友的評論可謂面面俱到，從主題（“追求成熟智慧”）到風格 / 手法 / 技巧（“將現代性熔鑄於中國傳統之中”、“經營出一種十分令人不安的怪誕意象”）再到譯詩本身（“非常出色”、“不但準確地譯出，而且保留了原詩的聲律”）均有提及。在主題方面，這條評論彌補了專業讀者對《大海停止之處》評論的空白。而在風格 / 手法 / 技巧方面，則與前文中所引專業讀者的觀點遙相呼應，例如現代主義手法的運用（只不過在Newey [2000] 和Twitchell-Waas [2000] 那裏具體指超現實主義）和意象的奇異怪誕、不循常規。在譯本本身方面，又與亞當·紐維的觀點相互

補充——亞當·紐維更為關注翻譯模式，即作為文本處理者的譯者；網友James則著眼於語言層面，即作為譯者處理對象的文本。

2014年1月26日，網友Black&white與英語世界讀者分享了自己閱讀《大海停止之處》的體驗：

恢弘的幻象，怪異又極度暴力。初讀之際，你會為它們所吸引，但它們的意義卻晦澀難懂。慢慢地，你又會開始明白它們指的是什麼……在我看來，楊煉已然躋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列……

由於只是一位普通讀者在描述自己閱讀過程中的主觀感受，因此行文中基本找不到直接論及主題、風格／手法／技巧以及譯本本身的字句。但細讀之下，“恢弘的幻象，怪異又極度暴力”和“意義……晦澀難懂”兩處在很大程度上與超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技巧的特點相吻合，恰恰反映了楊煉的詩風。

通過以上對專業讀者譯評和普通讀者譯評的分析可知，英譯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評介情況具有以下幾點特徵。其一，對於專業讀者的影響遠大於普通讀者。其二，譯評的作者們對英譯楊煉詩歌文學性的關注多於其政治性，幾位普通讀者甚至對政治隻字未提。其三，在所有關於文學性的討論中，對風格／手法／技巧著墨最多，主題次之，譯本本身最少。其四，評者們對主題的解讀集中於虛偽、醜惡、暴力、流亡和死亡，對風格／手法／技巧的剖析落腳於晦澀難懂、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手法和意象的非常規運用，而對譯本本身的評論則大多流於浮泛。

四、由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說開去

本文以“考察館藏分佈情況”和“分析譯評”兩種方法，分別考

察了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情況。至此，筆者在開篇提出的幾個問題已經可以得到初步的解答。傳播方面，英語世界收藏《大海停止之處》、《面具與鱷魚》和《同心圓》的圖書館數量最多，《大海停止之處》、《同心圓》和《騎乘雙魚座》則在英語世界分佈範圍最廣。因此，無論以收藏館數還是分佈範圍衡量，《大海停止之處》都是傳播情況最為理想的。接受方面，《大海停止之處》、《面具與鱷魚》和《幻象城市》受專業讀者評介最為頻繁，《大海停止之處》和《幸福鬼魂手記》則得到了普通讀者的關注。因此，《大海停止之處》在專業和普通兩大讀者群中的接受效果都是最為理想的。除翻譯評論之外，譯作在目的語國家或地區獲獎與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接受情況。在這方面，《大海停止之處》曾於出版當年斬獲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英譯詩集獎（1999 Poetry Book Society Recommended Translation），《敘事詩》則在18年後拿下了同一獎項（2017 Poetry Book Society Recommended Translation）。綜合以上，《大海停止之處》無疑是楊煉12部英譯個人詩選當中最為成功的一部。如果我們不限於12部個人詩選，而是把視域擴大到所有收錄楊煉詩作的英譯中國新詩選集，並將楊煉詩歌英譯活動中的翻譯目的、文本選擇、翻譯模式與傳播和接受效果關聯起來考察，還可以發現一些十分值得玩味的現象。

中外譯者英譯中國新詩的目的共有“為詩而譯”、“為時而譯”和“為史而譯”三種，分別注重詩歌內在的美學特質、詩歌背後的時代語境和詩學規範的歷史演變。其實不獨新詩如此，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中的其他體裁莫不如此，都以內在的文學價值、背後的政治等非文學因素和某一特定體裁的發展歷程吸引著異域的譯者和讀者。縱觀26部收錄楊煉詩作的英譯中國新詩選集，英語世界譯介楊煉詩歌的目的以“為詩而譯”為主，“為時而譯”、“為史而譯”為輔，同時兼有“詩、時

皆譯”、“詩、史皆譯”的情況。本文集中考察的12部個人詩選中，除《與死亡對稱》和《流亡的死者》“為時而譯”、《無人稱》“為史而譯”之外，其餘均為“為詩而譯”的產物。參考前文可知，《與死亡對稱》、《流亡的死者》以及《無人稱》幾部選集雖然在出版不久之後得到了個別專業讀者的評介，但時至今日英語世界卻已經沒有任何一家圖書館予以收藏。由此可見，**優秀的作品本身比背後的政治風向和文學史的源流演變更具生命力、影響更長遠**，應成為譯介活動中最主要的考量。

文本選擇情況是翻譯目的的直接體現。在上述幾種翻譯目的共存與交會作用之下，除“饕餮之問”和“空間七殤”兩部近作之外，楊煉創作於1978-2009年間的作品基本都已得到了規模各異、頻率不一的譯介。其中短詩組“無人稱”和“十六行詩”中的作品譯介規模最大、頻率最高，有不少詩作的英譯本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3種，似乎頗受英語世界青睞。然而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集中收錄這些作品的《無人稱》和《幸福鬼魂手記》兩部選集的傳播和接受情況都居12部選集的後列。由此可見，**譯者樂於選譯的未必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同理可推，英譯個人詩選數量居所有中國新詩人之首的楊煉，其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是否一定大於同一流派的北島（9部）、多多（4部）、顧城（3部）、舒婷（1部）、食指（1部）、江河以及芒克（截至2017年均為0部）等詩人？譯介成果最為豐碩的朦朧詩派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又是否一定大於其前的九葉、現代、新月和其後的他們、莽漢、非非等流派？楊煉的案例告訴我們，此類問題唯有通過研究考察纔能做出回答，僅憑目的語國家的譯介規模和頻率或者聽信譯者甚至作者訪談中的隻言片語便下論斷都極有可能造成誤判。

楊煉詩歌英譯活動的翻譯模式主要有獨立翻譯（非自譯）、合作翻譯（與作者溝通）、合作翻譯（不與作者溝通）和集體翻譯四種，其中又以合作翻譯（與作者溝通）為主。如果結合本文集中考察的12部個人詩

選來看，**譯本的傳播與接受效果和翻譯模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無論譯文的具體生成方式如何，都需要經過目的語國家或地區出版商和編輯、校對人員的篩選，其語言品質可以得到最基本的保證（當然，如果外語譯本直接付梓於源語國家或地區，有時須另當別論）。在此基礎之上，翻譯策略和翻譯模式的考量纔變得可能和必要。而除這兩者之外，源語文本的世界性特質、譯語接受語境構成等因素均能左右譯文的傳播和接受情況。拋卻諸多因素不顧的所謂“如何譯之爭”和“誰來譯之爭”註定只是枉費唇舌。楊煉《大海停止之處》、《面具與鱷魚》以及《無人稱》幾部英譯個人詩選中的譯詩便可以佐證。以《大海停止之處》中一組題為“大海停止之處”的同名詩中第三首第二部分為例（見Holton 1999: 152-153）。原詩中意象紛繁密集、高度私人化，與已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中國詩歌意象體系相去甚遠。此外，這些意象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十分隱晦，對讀者的解讀造成了極大的挑戰。反觀譯詩，譯者霍布恩或獨力、或與母語為中文兼曉英文的作者溝通、或與不通中文的英語母語人士合作，基本如實地譯出了原詩的字面意義，幾乎未作任何闡釋。《無人稱》中原詩的風格、譯本的翻譯模式和譯者的翻譯策略均與《大海停止之處》高度相似，但二者的接受效果卻相差懸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面具與鱷魚》中譯詩的翻譯策略與《大海停止之處》基本相同，只不過出自陳順妍一人之手。然而，兩者的接受情況卻較為接近。換言之，翻譯模式的複雜化與多樣化並沒有顯著地提高接受效果。

五、結語

本文以朦朧詩人楊煉的12部英譯個人詩選為研究對象，利用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提供的世界各國圖書館藏書目錄和國家圖書館、北京大

學圖書館、讀秀-百鍊資料庫等學術檢索平臺以及亞馬遜網、好讀網等英語世界圖書/書評網站，同時參考譯本的獲獎情況，考察了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研究發現，由霍布恩翻譯、Bloodaxe Books出版社出版的《大海停止之處：新詩集》(*Where the Sea Stands Still: New Poems*, 1999)在英語世界收藏館數最多、分佈範圍最廣、專業讀者譯評數和普通讀者譯評數均最高，並且獲得了英語世界的翻譯獎項，是楊煉英譯個人詩選中最為成功的一部。此外，透過楊煉的案例，我們還發現：優秀的作品本身比背後的政治風向和文學史的源流演變更具生命力、影響更長遠；譯者樂於選譯的未必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的傳播和接受效果與翻譯模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希望通過本研究，可以厘清楊煉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並對中國新詩以及中國文學、文化的外譯研究和實踐提供一點借鑒。

注釋

- [1] 本文所謂“英語世界”，特指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6個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以及曾受上述國家殖民統治和/或設有上述國家出版機構分支的地區。
- [2] 迪莉婭·戴文(Delia Davin)在一篇譯評中同時評介了《面具與鱷魚》和《流亡的死者》兩部選集。為行文方便，本文以2篇計。
- [3] 參見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277638.Where_the_Sea_Stands_Still?from_search=true (最後檢索日期為2019年1月8日)。下文中網友Black&white的評論出處與此相同，不再重複注明。

*本文授予本刊期間，編輯部老師工作辛勤、匿名審稿人意見中肯，在此一併謹致謝忱。亦感謝筆者英雄100與英雄007鋼筆一對，書臺燈影，常伴在旁。

參考文獻

Balcom, John (1994). "Notes from the Margin: On Recent Translations of Modern

- Chinese Poet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8(1/2): 201-216.
- Bruno, Cosima (2006). "Review of *Unreal City: A Chinese Poet in Auckland*". *The China Quarterly* 47(3): 810-812.
- Christ, Ronald (1982). "On Not Reviewing Translations: A Critical Exchange". *Translation Review* 9(1): 16-23.
- Davin, Delia (1991). "After Death, Exile——*Masks and the Crocodile: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by Yang Lian with translation by Mabel Lee / *The Dead in Exile* by Yang Lian and translated by Mabel L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ust 9.
- Holton, Brian (trans.) (1999). *Where the Sea Stands Still: New Poems*.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 Klein, Lucas (2018). "Review of *Narrative Poem*".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27(2): 274-279.
- Lee, Gregory (1991a). "Review of *Masks and Crocodile: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The China Quarterly* 32(2): 385-386.
- (1991b). "Review of *The Dead in Exile*". *The China Quarterly* 32(4): 859.
- Leung, Kai-cheong (1993). "Review of *Masks and Crocodile: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7(1): 234.
- Marijnissen, Silvia (2003). "Review of *Notes of a Blissful Ghost*". *Pacific Affairs* 76(3): 461-462.
- Newey, Adam (2000). "Review of *Where the Sea Stands Still: New Poems*". *New Statesman*, January 24.
- Patton, Simon (1993). "Review of *Masks and Crocodile: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5(2): 206.
- (1995). "Review of *Non-Person Singular: Selected Poems of Yang Lia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9(4): 871.
- Schulte, Rainer (1995). "The Reviewing of Translations: A Growing Crisis". *Translation Review* 48-49(1): 1-2.
- (2000).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Craft of Reviewing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 Review* 60(1): 1-4.
- (2004). "Reviewing Translations: A History to be Written". *Translation Review* 67(1): 1.
- Twitchell-Waas, Jeffrey (2000). "Review of *Where the Sea Stands Still: New Poem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4(2): 354-355.

《翻譯季刊》第九十一期

—— (2003). “Review of Yi”.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7(1): 92-93.

Wang, Yiyang (2006). “Review of *Unreal City: A Chinese Poet in Auckland*”. *Pacific Affairs* 79(3): 513-514.

李新宇 (1993), 《中國當代詩歌潮流》,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

李振聲 (1996), 《季節輪換》, 上海: 學林出版社。

王金波 (2016), 〈庫恩《紅樓夢》德文譯本的流傳與接受——以德語世界為例〉, 《紅樓夢學刊》2: 282-315。

王穎沖、王克非 (2015), 〈洞見、不見與偏見——考察20世紀海外學術期刊對中文小說英譯的評論〉, 《中國翻譯》3: 42-47+128。

作者簡介

趙雲龍,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在讀博士。曾在《中國翻譯》《東方翻譯》《外語與翻譯》等譯學期刊發表專論多篇, 在《英語世界》《英語文摘》等刊物發表譯文若干。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 目前正從事中國新詩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傳播與接受研究。

電郵地址: zhao_yunlong@bfsu.edu.cn

回憶錄



香港翻譯學會的發展 (1991-2018)(二)

劉靖之

研討會、學術會議

在1991年至2006年裏，學會與香港的大學、公共圖書館、國內的翻譯協會／學會、國際譯聯等學術機構和專業組織聯合舉辦研討會，規模較大的如與嶺南學院翻譯系和文學及翻譯研究中心聯合組織舉辦的“武俠小說英譯研討會”(1996年3月22、23日)、與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聯合主辦的“外文中譯研究與探討學術會議”(1996年4月1-3日，同時舉行大型翻譯書展，有20餘家海峽兩岸三地出版社參展)、與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中文大學翻譯系聯合主辦“1997翻譯教學研討會”(1997年12月2-4日)、與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上海科技翻譯學會聯合主辦“1999上海翻譯研討會”(1999年11月1-4日)、與國際譯聯、香港大學和嶺南大學聯合主辦“國際譯聯第三屆亞州翻譯家論壇”(2001年12月6-8日)、與嶺南大學翻譯系和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聯合主辦“第二屆清華-嶺南翻譯研究研討會”(2004年6月5、6日)、與香港中央圖書館聯合舉辦“翻譯與藝術研討會”(2005年5月29日，並於2005年9月2-5日舉辦“賴恬昌書畫展”)等。

在上述研討會裏有的別開生面，如“武俠小說英譯研討會”，是當時嶺南學院文學院院長、翻譯學會榮譽會士劉紹銘教授提議召開的，提交論文的有武俠小說《鹿鼎記》英譯者 John Minford(閔福德)、澳洲國立大學漢學家 Geremie R. Barmé(白傑明)、臺灣翻譯學者、閔福

德在香港理工大學的博士生賴慈雲、嶺南學院翻譯系系主任黃國彬教授、英國漢學家、《水滸傳》英譯者John Dent-young等。這幾篇論文收入《翻譯季刊》第5、6期“英譯武俠小說專號”(1997年4月)。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出版了單行本(1997)。又如“1997翻譯教學研討會”是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之後立即召開的，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選擇“翻譯教學”較任何其他主題更符合學會的創會的宗旨：“純學術性組織”的學會。

“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是繼1991年與夏威夷大學合辦的“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ridging East and West”研討會之後的另一次國際會議，規模更大，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180餘人，提交論文的超過100篇。《翻譯季刊》編輯部從這百餘篇論文裏，挑選了35篇，分七期刊登在第23-29期裏(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作為慶祝學會成立30週年的活動之一。

“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於2001年12月初舉行之後，學會的元氣大傷，直到2004年6月5、6日才與嶺南、清華聯合主辦“第二屆嶺南——清華大學翻譯研究研討會”、2005年5月29日舉行“翻譯與藝術研討會”，後者就翻譯與舞臺、電影、音樂與書畫進行研討。回顧學會在成立後的第二個20年裏(1991-2011)，主辦的研討會較1971-1991年在次數上少了些，尤其是在2001年12月的“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之後，但在1991至2001年的十年裏，所主辦的研討會規模和影響遠非1971至1990年間所主辦的幾次可以相媲美。從地域上來講，1971至1991年間的研討會都限於本地代表，而1991-2001年間所主辦的研討會則是全國(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亞洲太平洋地區以至全球範圍的翻譯界。2001年之後學會在組織大規模的研討會表現得甚為消極，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由於香港的大學管理文化的改

變，教師教學、研究、行政工作量增加；年輕一代翻譯學者對義務工作的態度的改變，與早一輩的取態截然相異，等等。

講座、論壇

隨學會並沒有減少講座和公開翻譯論壇方面的組織工作，雖然減少了午餐例會的次數（從每兩個月一次改為每學期兩次），但學會與其他機構如香港中央圖書館和各大學合作主辦講座的次數則有所增加。

由於學會會員有各大學翻譯系和翻譯課程的教師，因此學會的講座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主講者，如上海復旦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陸國強教授主講〈從語義角度看翻譯〉和陸谷孫教授主講〈客觀描述而不是主觀規範——滬版《英漢大詞典》簡介〉（兩位均在22/2/1992午餐例會上主講，講稿刊登在《譯訊》第33期，1992年6月出版）。在這段時間裏，應邀主持講座的包括：捷克Charles大學Oldrich Kral教授：“Thinking Through Translation”（18/11/1996）、斯特哥爾摩大學漢學講座教授Göran Malmqvist（馬悅然）：“From an Amateur Translator’s Workshop”（27/4/1996）、旅美中國翻譯家金隄教授《尤利西斯》的中譯（19/9/1998）、北京大學英文系許淵沖教授：“翻譯最新動態”（14/10/2000）、南京大學外語系許鈞教授“國內翻譯研究”（9/12/2002）、香港政府律政專員嚴元浩：“香港法律翻譯淺談”（24/2/2001）、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與亞州語言講座教授鄒嘉彥：“地球村及漢語辭彙的發展”（28/4/2001）、香港政府“法定語文專員”（Commissioner for Official Languages）Agnes Allcock女士：“A Snapsho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s Language Policy”（“兩文三語漫談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2/3/2002）、法國Bordeaux大學榮休教授André Levy：“Translating Literary Chinese : English Easier than French ?”

(18/5/2002)、香港城市大學翻譯課程副教授朱純深：“Is Dead Metaphor Really Dead? Ontological Metaphors and Metaphor Translation.”（“從本體譬喻看譬喻的翻譯”）（5/10/2002）、香港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Victor Mair：“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7/12/2002）、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翻譯課程譚戴喜教授：“翻譯與文本的三種關係”（15/2/2003）、香港政府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梁爵士：“我如何翻譯中國古典文學”（26/4/2003）、嶺南大學翻譯系主任黃國彬教授：“翻譯但丁的《神曲》”（31/7/2003）、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語言學系助理教授Robert Neather（倪若誠）博士：“博物館資料翻譯”（27/12/2003）、香港翻譯學會會長劉靖之教授：“翻譯新焦點——《翻譯新焦點》發佈會”（29/11/2003）、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系Professor Vijay Bhatia：“Language of the Law-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法律的語言——口譯與筆譯”）（7/27/2004）等。上述講座是引錄自《譯訊》第33期（1992年6月出版）至第43期（2004年3月出版）。換言之，在2004年9月至2009年9月的五年裏，《譯訊》只出版了五期，從2010年9月至2017年9月的七年裏，僅出版了四期。很明顯，有許多講座因《譯訊》脫期而漏掉了！

在第45至48期裏，《譯訊》報導了一些頗有趣的講座：香港浸會大學鐘玲教授：“How was Gary Shyder’s Translation of Han Shan’s Poetry Canonised in the West？”、香港中文大學方梓勳教授：“字母翻譯的臥虎藏龍”（20/11/2004）、漢學家Graham Earnshaw：“Martial Arts Transl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and Scienc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The Book and the Sword*”（29/1/2005）、漢學家Bonnie S. McDougall：“The Pains and Gains of Translating and Being Translated: Translat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Beijing in the 1980s”

(9/4/2005)、香港公開大學John Minford教授：“Translating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18/6/2005)、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Hugh Baker教授：“Foreigner’s Mooncake” (8/10/2005)、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訪問學者龍應臺教授：“從創刊看文化心靈——以德語為例” (20/4/2006)、臺灣大學榮休教授、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林文月：“最認真的讀者：談談我的翻譯經驗與心得” (20/5/2006)、臺灣翻譯家/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黃文範：“英漢文學翻譯詞典淺議” (25/11/2006)、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黃國彬：“向心翻譯與離心翻譯” (25/11/2006)、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譯審、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羅新璋：“譯文增刪” (25/11/2006)、英國Aston大學副校長 / 德語系講座教授 / 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Nigel Reeves (利富思)：“Bertolt Brecht and the Chinese Literacy Tradition：From Translation to Inspiration” (25/11/2006)等。

上面的講座題目都是從《譯訊》裏整理出來的，早期的講稿還散見於《譯訊》，千禧年之後就只刊登講者、講題和日期，可能是由於會務增多，活動頻繁，限於資源而無法刊錄，再加上多次脫刊，遺珠甚多，十分遺憾！從上述開列的講者、講題，我們對過去學會所安排的講座，講者均為有學之士，講題內容皆為值得研究之課題。在我積極參與會務的30年裏(1976-2006)，曾盡力將內容充實的講稿收入學會所出版的論文集和《翻譯季刊》裏，供學者參閱。

會員的著作

《譯訊》有幾期報導會員的著作，值得談談，由於經常脫期，相信有不少遺漏，唯有選擇一些在《譯訊》上介紹過的、較有趣的回顧一下。

在第12期裏(1997年1月出版),有這麼一段題為“紅樓夢西遊記”的介紹:“本會會員宋淇(筆名林以亮)曾於一九七五年分別在《明報月刊》及臺北《書評書目》月刊發表細評霍克思英譯《紅樓夢》之專文。此文頗長,共分八期連載刊出,並獲得臺灣“文藝期刊聯誼會第二屆最佳批評論文金筆獎”。現已彙集成書,定名為《紅樓夢西遊記》,於一九七五年九月由臺北經聯出版事業公司發行出版。該書有兩大特色:一、由霍克思親自作序,評論者及受評論者如此合作無間,實乃文壇佳話。二、葉公超為當代書畫大家,特為本書題書名並寫賈寶玉‘四時即事詩’屏條四幅,彌足珍貴。林以亮的這本書,實是近代中國翻譯批評之經典之作,是我任教碩士學位翻譯課程的重要教材之一。我一向認為這類中英翻譯批評較目前那些空空洞洞的翻譯理論更紮實、更能對症下藥、更能解決問題。在第17期(1978年6月)的李達三、周兆祥合編《英漢漢英翻譯書目》裏,收入了《林以亮論翻譯》(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這本書收入了林以亮的論文9篇,包括〈翻譯的理論與實踐〉、〈顏色的翻譯〉、〈翻譯與社會發〉等,都是1980年代以前發表的重要翻譯研究論著。

1980至1990年代,學會會員的著作大部分收入《翻譯叢論》(一九八三、一九八六、一九八八等三冊)、《翻譯工作者的手冊》(1991)、《翻譯新論集——香港翻譯學會二十週年紀念文集》(1991)、*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Bridging East and West* (1994)、《傅雷與他的世界》(1994)、*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 Martial Art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97)、《翻譯教學研討會論文集》(2000)等論文集。

199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百科全書規模的巨著:陳善偉與David Pollard合編的*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這部詞典分97個專題研究項目,如聖經翻譯、兒童文學、商業翻譯、文化文體與翻譯、音樂翻譯、翻譯理論的實踐等。每章

以論文形式發表，作者均為研究有關專題的專家。另一部大部頭譯著是榮譽會士黃國彬“耗時二十餘年，完成首部由義大利文譯成的三韻體《神曲》中文全譯本：不但精確的表達原詩精神，更輔以百科全書般的詳細注釋，幫助華文讀者領略前所未見的世界。”（《譯訊》第43期，2004年3月）黃國彬的中譯《神曲》（*La Divina Commedia*），原著為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領軍人物。《神曲》分〈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臺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出版。黃國彬的《神曲》中譯，其工程之龐大，可與霍克思、閔福德和楊憲益、戴乃迪的《紅樓夢》英譯媲美。

資深會員、榮譽會士黎翠珍教授用粵語翻譯了18部劇本，由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與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於2005、2006年分兩輯出版。第一輯的9部劇本包括《雨後彩虹》、《搖搖一生》、《難得糊塗》、《畫廊之後》、《李爾王》、《神火》、《伊狄帕斯王》、《長路漫漫入夜深》、《深閨怨》；第二輯的9部有《炙簷之上》、《真相》、《大團圓》、《侍婢》、《羅生門》、《長橋遠望》、《邊個怕維珍尼亞吳爾夫》、《生殺之權》、《動物園的故事》。這18部劇本中有15部已經在舞臺上演出過，效果極佳。終生會員張佩瑤如此評論：“黎翠珍以廣東話翻譯，加以無比創意，把原劇蘊含的情感帶給觀眾，時而細膩無比，時而氣勢澎湃，有淡如白開水的文筆，也有濃墨式的灑脫，無論是王者的氣派、少女的情懷、義憤填胸的怒吼，她都能捕捉得到，拿捏得准，使用與原文差不多的力度，輕重得宜地表達出來。她的譯文無處不是音樂，是獨特的節奏加上多聲部的組合所帶給人的聽覺上的享受，有質感、有動感、層次多、衝擊大，令人回味無窮。”（《譯訊》第46期，頁19）

浸會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主任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於2006年出版了她編撰、評註的*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第一卷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ST. JEROME)。在《譯訊》第47期裏，有這麼一段話介紹：“翻譯在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翻譯、口譯、佛教和尚、耶穌會會士、新教傳教士、作家、歷史學者、語言學學者以至大臣、皇帝等均論述過翻譯，意見紛陳，百家爭鳴。這些視角不同、觀點相異的翻譯觀匯集於兩卷中國翻譯文選。第一卷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12世紀，收入有關政府的翻譯文選，包括佛經的翻譯”。(頁11)張佩瑤不幸在第二卷(從12世紀至1800)大致完工而尚未出版時去世。後經同事 Robert Neather 博士、Theo Hermans 教授(來自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訪問學者)和邱偉平博士三位共同合作，將第二卷文稿整理出版 (Routledge 2017)。

這兩卷從公元前5世紀到1800的中國有關翻譯的文選是中譯英另一項值得重視的大工程，參與文選、編撰、評註、翻譯除張佩瑤外，還有林成蓀(顧問編輯)；9位顧問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本會榮譽會士羅新璋、會員朱志瑜、北京外語學院范守義、西南交通大學傅勇林等；負責翻譯的包括學會榮譽會士黎翠珍、會員余丹等。這套英譯文選獲得漢學界一致好評。

在英文論著方面，會員張南峰的 *Yes Prime Manipulator: How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ritish Political Humour Came into Being* (HK: CUP 2005) 以描述翻譯學為框架，分析作者自己的譯作《好的，首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旨在探討翻譯的功能、過程和產品三者之間的關係。張南峰嘗試反思各種翻譯理論，尤其是多元系統及“操縱學派”的有關理論，並提出多元系統論擴充版，為研究譯者角色以及翻譯所涉及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提供更全面的理論框架。

會長陳德鴻 (Leo Chan Tak-hung, 2010年開始擔任會長) 的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2004) 收入了38篇英文文章，其中有四篇英文論文是陳德鴻的英文文章，討論此書所涉及翻譯理論的中文特點，其他34篇是翻譯教師和學者從中文翻譯為英文的文章。陳德鴻的四篇分別是：一、對傳統翻譯“印象理論”的論述，尤其是嚴復的信、達、雅三項標準原則、傅雷的形似與神似以及錢鍾書的化境。二、第二篇討論1920-1930年代的“現代”理論，討論的對象有魯迅和瞿秋白以及反對魯迅“寧信不順”理論的茅盾和梁實秋。三、第三篇是討論後殖民主義觀點，包括“大眾語運動”、保持中文的純潔性，代表人物包括蔡思果、余光中等人的觀點；以及1990年代的、以劉宓慶為代表的“建立中國翻譯理論”主張。四、第四篇的題目是“End of the Century: The Impact of ‘New Theories’”(《世紀的結束：新理論的影響》)敘述歐美翻譯理論傳入中國，從1990年代的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至 Newmark、Nida、Derrida、de Man、Venuti等人的理論。陳德鴻還提及香港六所大專院校翻譯課程所開列的翻譯理論書單與都柏林City University所開列的翻譯理論書單，除了Mounin外，其他的如Catford、Baker、Reiss、Vermeer、Holmes、Bassnett、Snell-Hornby等，完全一樣。這種情況說明了“比較傳統的理論家”輸了給新一代歐洲理論家(頁46)。陳德鴻用臺灣“書林譯學叢書”來進一步證明他的看法。他列出了10本“書林譯學叢書”，說除了劉宓慶《當代翻譯》(1993)和黃邦傑《譯藝譚》(1988)有些語言學背景外，其他大部分屬於印象、經驗性質的傳統觀點。陳德鴻在結束段落裏，歎息說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的微觀處理和對文化背景(包括意識形態、歷史、哲學、法律、風俗等等)的宏觀考慮之間難免互相鬥爭。他希望中國翻譯學者敢於投入翻譯實驗，以證明理論的實踐價值。

陳德鴻的這四篇文章，其實是中國20世紀頭80年的翻譯理論簡史，沒有涉及張佩瑤的古代佛經翻譯史。陳德鴻的這本書雖然只有短短的57頁，但中英文參考資料達102種，非常豐富充實！這四篇文章很顯然是以英語讀者為對象，而英語翻譯理論研究者裏好像沒有人懂中文，而懂中文的翻譯家如Gladys Yang、David Hawkes、John Minford對翻譯理論全然沒有興趣。這就導致另一個現象：西方翻譯理論家的理論建立在不同於中文／漢語的翻譯語種和實踐上，在經過了近30年西方翻譯理論衝擊下，中國翻譯理論界獲得了哪些心得體會？1980年代以前，中國的翻譯心得體會（假如信、雅、達只能算是三種標準，談不上理論的話）只限於文學翻譯，在實踐上當然不夠廣泛，那麼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科研和應用科學有大進步，在翻譯上早就超越了文學翻譯範疇，在翻譯理論上的研究，尤其是在中英、英中翻譯方面應該有所收穫，到目前似乎沒有顯現出來。

陳德鴻還有一本Rodopi出版的*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譯訊》第46期，2006年4月）。此外，執委會委員朱志瑜、朱曉農的《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譯註》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訊》第47期，2006年11月）。

有關口譯的論著很少，會員、嶺南大學翻譯系教授龍惠珠（Rachel Lung）於2011年出版了一部*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是值得翻譯界重視的口譯歷史研究專著。在“前言”裏，作者說這部著作是她2005-2009年三項研究計劃的成果。全書十章，涵蓋從西漢、東漢至唐朝有關口譯的文獻記錄，包括口譯員的身份、倫理道德、人際關係等。作者雖然敘述的是中國口譯歷史，但文獻裏很多口譯員不全都是中國人，有不少是索格底人，因此歐楊楨（Eugene Eoyang）教授在評論這本書時說，龍惠珠的*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證明了“中國在全球

化之前早已國際化了”。

學會會員的專著絕對不止上述所報導的，肯定有一些沒有報導或漏了報導的。當然，上面報導的著作只是《譯訊》刊登的部分較有代表性的。這些著作說明了學會會員在翻譯、翻譯教學、翻譯研究上所達到的水平、所作出的貢獻。

《譯訊》還偶爾刊登頗有趣的訪談，如陳德鴻訪問的三篇“Retiring for the Second Tim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Ching Chih”（《譯訊》第44期，2004年9月）、“A Germanist as Translator: A Conversation with Nigel Reeves”（《譯訊》第48期，2009年9月）、“Two Translators, One Text: A Conversation between David Pollard and Leo Chan”（《譯訊》第52期，2016年10月）。我們的會員也接受別的刊物訪問，如刊登在臺灣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的《編譯論叢》，由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紀錄的〈翻譯面面觀：陳德鴻教授訪談錄〉（第八卷第二期，2015年9月，頁175-200）和〈從翻譯到文化：張南峰教授訪談錄〉（第十卷第一期，2017年3月，頁159-188）。

獎學金、翻譯和口譯比賽

學會每年都頒發翻譯和口譯獎學金，並協助半島青年商會主辦香港青年翻譯和口譯比賽，以鼓勵青年有志翻譯和口譯的莘莘學子。

獎學金

學會於1992年設立“香港翻譯學會獎學金”頒發給在香港各大學主修翻譯的學士和研究生，以鼓勵他們，並同時促進翻譯學科的建設。這項獎學金每年頒發給6名主修翻譯畢業生，分學士和研究生兩種。最初這個獎學金以1000字的文章作為研究生的評審方式。1998年開始改

為由各大學有關學系的推薦，然後由學會委任的評判小組選拔6位得獎者。這項獎學金歷年來得到多方面的資助：牛津大學出版社、合盈國際集團公司區永熙先生（1992-2002）、培生教育出版中國/朗文亞州有限公司（1992-2001）、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1998）、張開齡女士（2002）、亞非紡織集團副主席陸增鏞先生、震雄集團（2006-2008）。

學會於2004年設立“獅球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從2005年度開始以港幣一萬元獎勵一名研究生，申請者需要呈交一篇論文（上限20,000字），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的研究均可申請。

港青年翻譯口譯比賽

由半島青年商會主辦、香港翻譯學會協辦的“全港青年翻譯與口譯比賽”，從1974年舉辦以來成為香港翻譯界的盛事。這項比賽是由香港政府民政事務總署贊助、全港社團聯合主辦的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其他比賽還有演講比賽、象棋比賽、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朗誦比賽、攝影比賽等等。“全港青年翻譯與口譯比賽”是這些比賽裏最有歷史也是最受歡迎的項目之一，多年來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與學生參加，對提高社會人士對翻譯的重視、促進本港的翻譯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

香港翻譯學會多年以來派代表擔任翻譯與口譯比賽的主席評判，歷任代表有劉靖之、金聖華、黎翠珍、吳兆朋等教授以及陳潔瑩博士。學會代表除負責統籌的評審工作、邀請大學翻譯教師和資深譯員擔任評判外，還協助比賽的推廣活動，並邀請嘉賓主持翻譯講座和撰寫報紙文章，籍此加強年輕人對翻譯技巧的掌握、加深社會人士對翻譯專業的了解。

榮譽會士

香港翻譯學會於1981-1991的十年間，共頒發了八次“榮譽會士”銜予21位人士，這21位翻譯成就卓越的學者專家全部來自香港、臺灣、中國大陸，也就是說都是炎黃子孫，除了戴乃迪，她雖然在中國居住了超過半個世紀，生活習慣徹底漢化了，但她始終保留了他的英國國籍。從1994到2006年，學會分四次（1994年10月、2001年12月、2005年9月、2006年11月）頒發“榮譽會士”予13位學者專家：陳佐舜、齊邦媛、金聖華、方平、John Minford、Eugene Nida、羅志雄、彭鏡禧、許鈞、黃文範、羅新璋、Nigel Reeves、黃國彬。其中有三位是英、美人士、三位是台灣人士、三位是中國人士、四位是香港人士，香港偏多，這是很自然合理的安排。由此可見，香港翻譯學會從第三個十年開始走向國際化，超越大中華地區，擁抱歐美大陸。這些榮譽會士的讚詞，請參閱《香港翻譯學會簡史1971-2006》，頁105-192。

如上文所述，頒授榮譽會士銜不僅鼓舞了從事這個專業的人士，還為年輕一代樹立了榜樣、促進文化交流和翻譯從業人員之間的交流、增進會員的凝聚力、提升學會的專業聲譽和地位。

參考文獻

- 陳德鴻、張南峰，編，（2000），《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翻譯季刊》，香港翻譯學會學報，第1期（1995年3月）至第84期（2018年6月）。
林以亮（1947），《林以亮論翻譯》，臺北：志文出版社。
林以亮（1976），《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劉靖之、林戍蓀、金聖華，編，（2000），《翻譯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劉靖之，編，（2003），《翻譯新焦點》，香港：商務印書館。

- 劉靖之、陳德鴻，編，(2011)，《蛻變中的中國翻譯研究》，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 羅選民，編，(2009)，《結構·解構·建構——翻譯理論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香港翻譯學會(1994)，《文憑及高級文憑考試簡介》，(1991年10月)，1994年4月修訂。
- 楊曉榮，編，(2012)，《二元·多元·綜合——翻譯本質與標準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譯訊》，香港翻譯學會會訊第一期(1972年8月1日)至第53期(2018年4月)。
- 余英時(2014)，《歷史與思想三十八年》，香港《蘋果日報》“蘋果樹下”，2014年4月27日。
- 朱志瑜、徐敏慧，編，(2015)，《當代翻譯研究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Chan, Leo Tak-hung (2004).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an, Sin-wai and David Pollard, ed., (1995).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 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Martha PY, ed., (2006).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Cheung, Martha PY & Robert Neather, ed., (2017).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2: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1800*,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o Hermans and Yau Wai-ping. Abingdon: Routledge.
-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1994). *Syllabus of Diploma and Advanced Diploma Examinations*, Effective from October 1991, Revised April 1994.
- Liu, Ching-chih, ed., (1997). *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Hong Kong: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College.
- Liu, Ching-chih & Leo Tak Hung Chan, ed., (2011). *Confluences: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Asian Contexts*. Hong Kong: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 Lung, Rachel (2011). *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ransl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No.1 (March 1995) to No.84 (June 2018).

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及版權問題，請譯者自行處理。

一、稿件格式

1. 請以電郵傳送來稿之電腦檔案。
2. 來稿請附200—300字英文論文摘要一則，並請注明：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注釋、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雙尖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 號用作一般引號；‘ ’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1）作者／編者／譯者；（2）書名、文章題目；（3）出版地；（4）出版社；（5）卷期／出版年月；（6）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六、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意。

七、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八、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九、來稿請寄：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referably be checked by a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s.

《翻譯季刊》徵求訂戶啓事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的《翻譯季刊》是探討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大型國際性學術刊物，由陳德鴻教授及倪諾誠教授出任主編，學術顧問委員會由多名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組成。資深學者，如瑞典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美國學者奈達博士及英國翻譯家霍克思教授都曾為本刊撰稿。《翻譯季刊》發表中、英文稿件，論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編輯的半年刊《翻譯學摘要》。欲訂購的單位或個人，請聯絡：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地 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 話：+852 3943 9800

傳 真：+852 2603 7355

電 郵：cup-bus@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 Its Chief Editors are Professors Leo Tak-hung Chan and Robert Neather, and its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pecialist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ield. The journal has previously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the Swedish Nobel Prize committee judge 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Dr. Eugene A. Nida,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Professor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its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edited by UMIST, UK.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should cont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Order Form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91 to 94(2019).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	<input type="checkbox"/> HK\$624 / US\$80
2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123 / US\$144
3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to No.90)	<input type="checkbox"/>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_____, total _____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 _____.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AMEX VISA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

Expiry Date: 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Telephone: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Ref: 20140402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